

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新知叢書

第一輯·第七種



工·恩·即
姜·君·辰
駱·耕·漢
合著

新知書店出版

新知叢書

第一輯·第七種

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錢俊瑞·徐雪寒·王
漁邨·姜君辰·駱耕漠 合著

新知書店出版

新知叢書第一輯·第七種
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實價三角五分▷

著者 錢俊瑞·徐雲寒·王
漁邨·姜君辰·駱耕漠

發行者 **新 知 書 店**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教育路七十號
長金衡常襄麗
沙華陽繼陽水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初版

序

這幾年來，跟着幾個朋友學習着中國經濟問題，自己感覺到研究的中心，前後有相當大的轉變。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吧，我們以社會改革為目標，來研究中國經濟。以為資本主義在中國不能有正常的發展，因之相當強調着整個改造的要求。這在基本上，我認為到現在還並未錯誤。不過從一九三五年以後，敵人加緊侵略中所引起的國內外條件的變動，使我們研究的任務也非得改變不可。就是要求建立起以抗敵救亡為中心的國防經濟。

這個改變，實際上是把前一時期的要求，更推進一步，達到解決問題的實踐階段。因之，並不是在根本點上取消前者。國防經濟的研究，更非一時的利用的政策了。

適當的問題雖則提出了，但是並不會被好好地完成，甚至不會去要求完成。一年多來，市場上所出現的，還大都是一些較為零碎的應時應景的關於經濟問題的文章，而把經濟上殖民地化的複雜過程，中國金融資本控制力的加強及其轉化的內容、限度和社會意義，各社會階層關係的變化，以及以抗敵為中心任務的經濟準備方案的研究等等切要問

題，竟常常被忽視。甚至對於不正確的經濟理論和實際運動的批判，這一二年來也顯得非常不夠。

本書的文章，大多都寫於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恰好如實地表示出這個研究時期的許多特點。在這裏，我們研究的態度有些變更了，問題是被提出來了，但問題的答案却還是十分不夠。這也正足以表示把握實踐的困難吧。

然而我以爲本書的出版還是有用處的，它是一本比較扼要地研究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入門書，指示正確的研究方法，提供基本的統計數字，對讀者不會沒有幫助。書中大部份文章是中國農村月刊上發表的『中國經濟講座』，它們本來就比較有系統。這次新知叫我來加以編集，對每一篇都曾經有相當多的修改和補充，使材料更充實些。同時其中第二第三兩講是我自己特地新寫的，因為這樣可以更加完整一點。

爲了完成本書第一講上所提出的要求，我們還希望許多研究者和學習者作更切實的努力！

徐雪寒

一九三七年霜沽編定紀念日於南京

目 錄

序

第一講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1

第二講 列強對華投資問題

- 一 強列對華投資簡史 ……………12
- 二 各國對華投資的陣容…………… 16
- 三 日本投資勢力的躍進…………… 20
- 四 結論……………25

第三講 中國金融問題

- 一 中國金融組織的演變…………… 27
- 二 中國金融資本的特質…………… 30
- 三 近年來的中國金融問題…………… 35

第四講 中國財政問題

- 一 什麼是財政…………… 41
- 二 現在中國的財政是怎樣的…………… 44
- 三 抗敵時期的財政怎麼辦…………… 51

第五講 中國貿易問題

- 一 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問題…………… 55
- 二 中國國際貿易的特質…………… 57
- 三 列強對華貿易戰的新趨勢…………… 60
- 四 中國國際貿易與國民經濟…………… 62

第六講 中國工業問題

- 一 中國工業的發展過程…………… 65
- 二 列強資本的機能…………… 67
- 三 殘壘自守的民族工業…………… 70
- 四 民族危機與民族工業…………… 75

第七講 中國農業問題

一	中國農業的特殊性	78
二	中國農業問題的全貌	79
三	中國農業問題的徵結及其動態	82
四	今後的救濟方策	86

第八講 中國交通問題

一	中國的交通事業	88
二	喧賓奪主的航業	91
三	突飛猛進的鐵路	94
四	一日千里的公路	97
五	天下三分的航空	98

第一講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我們要研究促成全民抗戰和保證抗戰勝利的社會經濟基礎——

在今天中國正是由一個半殖民地急速變為殖民地，同時全國規模的對敵人的武裝抗戰快要爆發的時候，我們來研究中國經濟，到底應當而且必須研究些什麼呢？一句話說完：我們要研究促成全民抗戰和保證抗戰勝利的社會經濟基礎，詳細點說，我們第一要研究：在日本帝國主義對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之下，中國的各種社會成份，那些一定會參加抗敵救亡的陣線，那些可能參加這條陣線，而那些定然會參加敵人和漢奸的陣線；同時，凡是與中國國民經濟有相當關係的許多國家，例如英美法蘇德意諸國，那些可能成為我們抗戰的友邦，那些可能成為敵人的與國。第二我們

要研究中國現有的資源和生產裝置應當怎樣配合着全民族的抗敵戰爭，進行必要的開發和動員，來保證抗戰的勝利。

有一些部份中國的『正統派』經濟學者，到今天只在那裏背誦亞丹斯密里嘉圖的原理，捧着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講義，跑上講台、跑下講台。這少數的先生們不是有意地在替我們民族的敵人作理論上的辯護，便是無意地作成了民族敵人的俘虜。這種現象當然是可恥而又可悲的；然而這種可恥和可悲的現象却有它一定的社會根源，那些『裝金』了的經濟學者到今天還沒有接觸到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大眾瘋狂的掠奪，到今天還沒有聽到和見到中國大眾救亡的呼聲和行列，他們的利益還能安放在銀行和最高學府裏面。他們今天所要求的只是如何在『滔天皇恩』之下，讓他們的金屋殿堂繼續存在，因此他們願意捧着那些經濟學上的陳言爛說，來討好敵人，包庇自己。他們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證明敵人的侵佔我領土，虐殺我人民之為合理；用自由貿易說來解釋敵人侵奪我市場，實行武裝走私，也是一種『科學的行爲』。他們否認貨幣權爭奪的理論，來掩護日本和其它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財政金融的進攻；他們又用經濟發展程度決定民族興亡的機械理論，來證明敵人滅亡中國是『天演公理』，而中國民族的淪亡也是必然的歸宿。我們知道那些稍有『良心』的學者雖則可以不看到東北四省的淪陷，可以

不看到華北內蒙的被敵人武裝佔領，可以不看到幾千萬同胞的被人奴役和屠殺，然而他們不能不看到平津學校的被人勒令遷移，華北各校校長和教授的被人驅逐；因此他們也就『不禁有動於中』，背棄他們一向保持的謬說，同情於救亡的正確理論和行動。然而另外竟有些恬不知恥的名流學者，在這種情況之下，竟還能運用其腐朽的經濟理論來奉迎敵人的意志。某博士的中日經濟提攜論，便是著名的例子。

另外有一部份經濟學者，他們往往滿足於背誦新政治經濟學的法則，只想努力研究商品價值，資本構成，生產過程乃至地租理論。等到他們一接觸到現實問題，不是感到頭痛，便是覺得生疏，他們往往不願參加實踐的過程，增進和糾正他們對於現實的認識，結果他們所習知的理論，就變成死板的教條，而無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和現實的改造。

此外，國內還有一部份經濟學者，他們站在科學的經濟學的立場，在發掘中國社會機構的內層，確定中國社會的性質，由此而說明中國社會改造的方向、任務、和動力。這種可敬的工作，對於中國求取解放的大眾，的確已經有了不可抹殺的貢獻；同時在中國學術界上也已經樹立起輝煌的界碑，然而在今天，當我們的民族敵人正在張牙舞爪，滿想一口氣把中國吞滅，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不求生存便是立即死亡的最後關頭的時候，這些學者在這種研究領域中的努力，

是不是已經算足夠了呢？

我們說，還沒有，而且差得還遠。第一，他們還沒有把國內社會改造和民族解放的任務正確地統一起來，尤其是還沒有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提到澈底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一位。這不僅是個疏漏，而且是個很大的錯誤。我們試問：在目前，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成殖民地的時候，還有什麼會比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更加神聖，更有決定的重要性呢？我們能設想在最大的民族敵人沒有給我們擊潰以前，我們能夠求得全般的社會解放嗎？我們知道，這是決不可能的。恰巧相反，我們主要的民族敵人一天沒有消滅，他們對於我們的生存權利便一天剝奪一天，他們對於我們要求解放鬥爭的壓迫，便一天兇過一天，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也不可能來放過我們民族最大的敵人，關起門來大談其社會改造的工作。當然我們在這裏又決不能機械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高高地掉在半空，跟社會改造的內容隔離起來。我們應當了解民族革命和社會改造兩者之間，有其有機的不可分的聯繫。我們更應當了解，今天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乃是完成內部社會改造的另一種形式。所以，我們知道，社會改造一定要跟着民族革命向前邁進；同時民族革命一定要社會的改造來充實牠的內容，保障牠的勝利，因為脫離社會改造的民族革命只是殖民地一部份有良心的統治階

層的幻想；牠是得不到大眾的參加和擁護的，因此也就是沒有動力的死東西。

我們不能否認，過去一部份經濟學者所以不談民族解放，的確是因為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經受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偏見的影響。他們怕談民族獨立與自主的問題，為的是他們怕被人家『貶』做民族主義者。他們怕說民族革命，為的是他們怕被人家罵做抹殺社會革命的混蛋。他們甚至不敢設想中國是一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他們『科學的頭腦』命令他們只能設想中國只是一個『社會』，一個由幾個階級和階層組成的社會。實際上這種了解可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是這麼一個社會，這是不錯的；然而中國却同時又是一個民族，又是一個具備着各種必要條件的國家。如果有人只認識到民族是個整個，只知道誇揚自己民族的優點，竭力要造成本民族對於別個民族的壓迫，那末他們只是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跟求取民族的獨立和自主是無關的。同時如果有人只能抽象地了解國家是超乎一切的權力，竭力想法擴充本國的領土，發揚本國的風光，那末他們只是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他們跟維持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也是毫不相干的。當然，無論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也好，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也好，他們都承認侵略是合理的行為，因此他們生長在帝國主義國家，便是徹頭徹尾的侵略主義者，而一到殖民

地半殖民地，却又往往搖身一變，成爲投降主義者的尾巴。

我們當然願意那些偏狹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能夠爲我們民族的獨立和祖國的解放而努力，而奮鬥，然而我們更希望他們能夠擺脫那種狹義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站到正確的把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的任務看做密切不可分離的觀點方面來。我們不怕承認中國是一個民族，恰恰相反，我們還誇耀我們這個古民族的光榮和優越，我們還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要憑着這種誇耀和熱愛，來摧毀我們民族的內外敵人。我們認爲，我們光榮的民族，我們偉大的祖國，在這一世紀來已經受盡帝國主義者獸性的踐踏，和國內奸細們無恥的污辱。我們固然看到，假若一個民族正在壓迫別個民族，那末這個民族本身一定不會是自由的民族；同時我們更能看到，一個被壓迫的民族，那就更談不到自由，反之，牠是受到內外敵人的雙重壓迫，因此被壓迫民族的大衆，首先就應當團集整個民族的力量，打擊內外的敵人，以求自身的獨立與解放。

沒有全般地充分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擺到第一位，同時沒有把這種任務和社會改造的任務有機地聯繫起來，這是目前一部份進步的經濟學者所犯的第一個毛病。

第二，那些經濟學者在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的研究上，的確用過很大的功夫，特別從兩次熱烈的論戰——中國社

會史論戰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以來，一般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結構，確乎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認識。這種研究的成果，一面是最近十年來社會實踐的結果；同時又使這種實踐推進了一步。

然而不幸得很，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因為研究材料的缺乏；特別是因為自身實踐的不夠，對於最近時期內——或是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社會經濟的變化，並沒有給以正確的評價。在這時期，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向完全的殖民地。這種情勢的急轉直下，已經使得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起了很大的分化，各個階層之間的對比也有很大的變化；這種分化和變化對於反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陣線的建立，可以說是非常有利的。

首先我們要說一說民族資本的陣營裏面所起的變化。過去我們認定：外國資本強烈的壓迫，使得我們的民族資本，失去獨立發展的可能；同時國內革命勢力的發展，又剝奪了民族資本反抗外國資本和削弱封建勢力的最後勇氣；結果我們的民族資本為要維持其豐厚的利潤起見，為要保證牠自身的存在不受致命打擊起見，就很自然地向外國資本投降，向封建主義妥協了。

這一種對於中國民族資本的估量，到現在是不是還算正確呢？是的，這種估量在基本上還是正確的，然而估量得

並不夠，特別在政治的意義上是不夠的。我們知道，從一九三一年以來，中國所受日本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進攻，已經使得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碰到了最後的危機，這其間大部份民族資本家也早已感到致命的威脅。不消說得，日本的資本靠了牠雄厚的軍事政治力量，向中國國民經濟進攻，結果民族資本的陣營，在他們沒有重新英勇地參加廣大的反×民族陣線之前，只有被打得七零八落，毫無存在的餘地。在另一方面，民族資本買辦化的必要雖然增加了，可是，買辦化的可能却在一天天減少，因為第一，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一天天趨於獨佔，其他帝國主義已經遭到最後的排擠；第二，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一天天採取直接統治的方式，買辦資本的功能已經在一天天縮小。這樣中國民族資本在牠主觀上已經祇有死路一條。

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民族資本，甚至於一小部份的買辦資本（特別是那些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外的帝國主義謀利的買辦資本），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可能不立即投降，而且有參加整個民族反×陣線的可能。日本在華的猖狂走私，迫得全中國的民族資本家不得不起來作最後的吶喊，這不是明顯的例子嗎？

其次，我們要說到農村中間的地主和富農。不錯，中國的地主和富農到如今還是用着半封建的剝削方式（富農有

一部份是用資本制的) 收奪下層農民的血汗，特別是地主，他們還是國內封建勢力的主人翁。然而我們單是這樣估量是不是夠了呢？不，還是不夠的。在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掠奪正在猖狂進行的時候，中國的地主，特別是富農，是可能起着某種程度的反抗作用的。當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搶到了我們的東北四省以後，一面實行大規模的武裝移民，一面便隨意沒收當地人民所有的土地。東北的地主和富農在這裏所受到的損失和威脅，使他們部份地可能同情甚至參加當地大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抵抗。而現在，在綏遠，在察北，在冀東，在河北，甚至在寧夏、山西、福建等地，日本都隨意在搶奪和強買土地，建造飛機場和軍營，或經營植棉場，鴉片田等，這無疑也會威脅到地主富農的身家性命和地田房屋。因此關內的富農，他們的經濟狀況一天天在惡劣了，同時他們以小資產者的資格可能蘊藏着一種熱烈的愛國情緒，而參加反抗國外民族敵人的民族陣線。

所有這些，我們前此都沒有周詳地估計到，而這種新的估量，對於目前正在進行着的決定民族存亡的決鬥，却有非常大的意義。因此我說，我們的經濟學者對於最近期內中國社會成份的比重及其地位的變化，並沒有去充分的估計，去充分地把具體材料加以整理，確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第三，我們過去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對於具體的

中國經濟問題，大多只有抽象的公式的說明，不是說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經濟本質，便是說民族資本買辦化，交通工業軍事性，銀行資本二重性等等。我們並不是說指出這些本質的說明不對，而是說，祇是這樣指出還不夠。我們不用具體事實來充實公式，倒以抽象的公式忽略了豐富的現實，那是不應該的。尤其是，在過去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太偏重於理論上『破』的工作，而很少注意到理論上『立』的重要。所以，在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中國經濟研究者的新的特殊任務，應該是從事研究以國防為中心的經濟理論。我們應當更加倍的努力，來研究各經濟部門的生產裝置和技術機構，以及自然資源與勞動力的分配，以便建立起抗敵條件下的經濟統制，乃至完成全國上下的經濟總動員以保證我們對敵抗戰的全面的澈底勝利。這個新的任務，在我們目前研究工作中應該占有最主要的地位。我們要嚴正地糾正過去把技術的範疇與社會的範疇機械對立起來的錯誤，我們要從民族的經濟總動員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的和技術的構成，而把這兩種社會的技術的範疇正確地聯繫起來。

自然，這一個新的任務，決不是幾個人寫一二篇文章所能完成的，牠需要研究中國經濟的人們共同來努力。

（錢俊瑞）

第二講 列強對華投資問題

——「利用外資」乎？「資本侵略」乎？——

我國近十年來，特別是在簽訂塘沽協定、偏安局面粗定以後，列強對華投資問題，便充分熱烈地討論起來。英美要通過國聯對華技術合作來對中國的半壁江山，進行資本的洗禮；日本却斷然表示拒絕（四·二七天羽聲明），而自己單刀直入地和中國『親善』，於是乎有中日經濟提攜（一九三五），華北經濟開發（一九三六），馴至於有『經濟外交』下的兩項合作（一九三七）等主張提了出來。人家對於我們，既然『寤寐求之』地這樣熱烈多情，在我們中國，便應該有許多熱烈的反應才對。所以有人主張在『利用外資』的大纛下面，不論英美德日，一概歡迎；另外有人認為這是『資本侵略』，統統關門拒絕。究竟應當怎樣，這就需要我們來研究對華投資問題了。

我們爲了易於正確的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有研究一下列強對華投資的本質和歷史的必要。

一 列強對華投資簡史

一般而論，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關係，是推銷商品，獨占原料和輸出资本，列強之對於中國，當然也不外乎此。自從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失敗以後，我們閉關自守的大門被打破了，英法等國在我國沿海的貿易便迅速發展起來，租界逐漸推廣到全國，沿海和內河的航行權，逐漸落到外人手裏，洋行制度也深入內地而確立了輸出入獨占的基礎。直到一八九五年爲止，外國資本雖則在我國有小規模的零星的產業投資，不過他的主要活動的傾向，是在推銷商品和購買原料；此外如建立租界，開發沿海及內地交通，和佈置洋行制度等，目的也祇在於促進對華貿易而已。但是，從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以後，情形便大大不同了，列強在華開始了強烈的資本戰，劃分勢力範圍的運動，便極度猛烈起來，甚至要瓜分中國。這就是說，帝國主義列強對於我國的關係，從輸出商品的貿易關係，進到輸出资本的統治關係了。爲什麼原因呢？這是在於第一，從一八九五年起，世界資本主義進化到帝國主義的階段，竭力要輸入資本到落後國家，來獲取超額利潤；爲了保護投資所在地的資本的安

全，需要在當地獲取軍事上政治上的特權，劃定資本活動的勢力範圍。第二，中國在中日戰爭中敗北以後，皇帝地主所領導的獨立自主運動，既然失敗，從軍事工業的移植，轉而進到一般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輸入運動，也就完全絕望（在當時的統治階層是如此看法的）。於是，外國資本的侵入中國，是更加便當了。二萬萬兩戰費的賠償，使媚外的滿清政府完全倒在外資的懷裏（當時借的法俄借款和兩次英德借款中，有百分之七十，約合英金185, 300千元，是在倫敦償付作日本的賠款。）因此，外資的侵入中國就往往運用政治借款，和鐵道借款等形式，換得了許多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奠定了外資統治中國的基礎。第三，在中日戰爭以後，馬關條約容許日本有在中國內地設廠的權利，此例一開，便馬上給各國引用最惠國條約的規定，作為列強所共有的權利。這樣，外資便可自由地侵入了中國的各個經濟部門（特別是壟斷重工業的部門，如煤鐵），而得充分地利用我國廉價的原料和剝削低賤的勞動力；這一面替中國樹立了近代化的基礎，却同時也替中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的發展前途，釘上了重重的鐐鐐。

到一九三一年為止，列強資本已經在中國的各個經濟部門，建築起雄偉的吸血的寶座，四萬五千萬的中國人民，都呻吟在這個巍然的寶座之下。中國二十餘年來之陷於內

戰，災荒和貧困之中，主要也就是受了這個列強資本統治的恩賜。（中國的封建勢力當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是列強資本在我國各經濟部門的投資數額和發展傾向：

	1914年		1931年	
	百萬美元	%	百萬美元	%
政治借款	33.3	20.5	427.7	13.2
運輸	31.1	33.0	346.3	26.1
郵電及公共事業	26.6	1.7	128.7	4.0
鐵業	19.1	2.7	21.9	4.0
工業	110.6	6.9	376.3	11.6
金融業	6.3	0.4	214.7	6.6
地產	105.5	6.5	379.2	10.5
輸出入	142.6	8.8	483.7	14.9
雜類	208.2	18.5	232.8	8.7

（引自雷麥：列強在華投資）

分別的說來，政治借款大多是賠款，其次是軍政費，都是用來進行內戰，消滅異己的（如像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這些借款，不僅是非生產的，完全是在吸取中國人民的膏血，而且還因此而喪失了海關權，鹽稅管理權等，直接貽禍於獨立自主國家的生存。政治借款的數額，雖則比例上是減少了，但絕對額竟增加了百分之七二。至於以鐵路交通等名目借入，而實際充作軍政費用的，尙未計算在內。

投資中數額頂大的是運輸事業，主要集中於航業和鐵

道，這不僅是列強藉此來開拓中國市場，而且是爲的要靠它來確立勢力範圍，便於軍事統治，這就是帝國主義初期經營殖民地的重要手段。其中屬於航業的，幾乎全部是直接投資，壓迫得華商航業，永遠翻不轉身來。屬於鐵道的，凡是外資直接建築管理，和借有外資的路線，共計11,780.99公里幾佔全國鐵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註一）這種喧賓奪主的情形，豈不是一幅神情畢現的寫照？

郵電公共事業的投資在二十年間，增加了一倍多，全國百分之六〇的電力，都被控制在外商手裏。鑛業方面，主要集中於煤鐵兩項：煤生產的百分之六〇左右，鐵生產的百分之九五，都由外人直接投資或借款經營。它們的目的祇在掠奪重工業原料，竭力避免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重工業。在輕工業方面，則集中於紡織烟草諸業，使民族工業岌岌乎難保苟安的地位。

外資在金融業方面的發展最足驚人；以近二十年而論，外資增加了三十四倍以上，上海外灘一帶，匯豐沙遜的巨廈雄姿，便是威臨中國金融貨幣市場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

（註一）：國內鐵路包括廣九路（143.3公里）北寧路（465.8）京滬路（404.5）滬杭甬（286.7）道清（165.44）津浦（1105.0）平漢（414.6）滬越（470.0）正太（278.2）膠濟（453.3）粵漢（1241.4）隴海（1108.0）南浦（123.3）浙贛南玉段（665.0）同蒲（396.0）。關外只計算奉山（419.6）中東（1721.0）南滿（814.8）三線，其他都略去了。

象徵。至於地產投資也增加得很快，它和金融業有不可分的聯繫，它也是使中國通商口岸繁榮，使當地中國人民，沒有立足安身之地的原因。以上海中區的地價而論，每畝從1903年的13,549兩飛漲到1933年的132,451兩，約為增加十倍，都成了外國地產商人荷包中的利潤！

至於輸出入方面的直接投資，據劉大鈞先生一九二八年統計，美國在華的進出口商有一二九家，日本有一〇〇家，美法兩國也不在少數。這許多輸出入公司，憑藉着歷史上的優勢，成爲推銷商品吸收原料的大機關，壟斷了中國的國際貿易。直到現在，中國和世界的關係，還要透過這些輸出入公司的媒介才得發生。每年十萬萬元以上國際貿易的商業利潤，固然是一筆極大數目，並且因之而能壟斷了我國國內外航業的運輸費用，其數目也大足驚人。

上面歷史的敘述和分析，使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數十年來中國和外資所發生的關係，我們完全被『資本』所侵略了，說是『利用外資』來開發中國，恐怕誰也不會相信吧？

二 各國對華投資的陣容

但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列強在華資本勢力的發展，也同樣是各有軒輊。大概說來，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國資本在中國佔着『惟我獨尊』的地位，奠下

了在華經濟勢力之堅實的基礎。一九一四年以後，特別是在大戰期內，日本資本在中國發展的迅速，也實在是空前的，日本佔領中國領土的野心，就此隨着這一時期投資的發展而成熟了。大戰以後美資在中國的發展，也非常迅速。日美資本在華的發展，在外表雖同樣是採取躍進的方式，但前者是以東三省為投資的重心，採取露骨的經營殖民地的姿態，後者却沒有特殊地帶可資依附，祇能單純地偏重於利潤的追求。至於德國資本在大戰剛剛結束以後，幾乎完全覆沒了。根據雷麥氏的統計，到一九三一年為止，列強在華投資的消長趨向如下表（單位百萬美金）：

	1902		1914		1931	
	投資額	%	投資額	%	投資額	%
英	20.3	33.0	607.6	77.7	1189.2	3.7
日	1.0	0.1	219.5	23.5	1131.9	3.1
俄	246.5	31.3	29.3	1.7	73.1	8.4
美	19.7	2.5	49.3	3.1	196.8	6.1
法	91.1	11.6	171.4	10.7	192.4	5.9
德	164.3	20.9	213.6	16.4	87.1	2.7
意	—	—	—	—	4.4	1.4
其他	5.0	0.6	29.6	1.8	120.6	3.7
總計	587.9	100.00	1610.3	100.0	3242.5	100.0

現在我們就把在中國最重要的三個投資國家即英日美

來逐一加以說明。

英國在華的資本勢力，到現在，的確不能像二十世紀初期那樣，占着絕對支配的地位，可是它的力量，却還大有左右操縱的可能。它在金融方面的勢力，實在高人一等，以匯豐銀行為中心，還有麥加利有利大英三銀行和中英銀公司福公司兩個投資新迪加在環繞着。在過去，它曾用政治借款的方式，操縱了北京政府的生命，替帝國獲取不少的特權。一九一四年，中國有百分之四二的政治借款是英國供給的。目下這許多英商銀行還是中國官僚『血錢』的避難所，它們擁有鉅額的存款，足以控制中國的金融貿易等市場而有餘。在交通方面，英國資本也是有特別巨大的勢力。在已成鐵路之中，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借有英國資本的，有平潘、平漢、津浦、京滬、滬杭甬、廣九、粵漢等路綫。總計在這方面未償還的債款，還有144,953,959元（一九三五年底）。在海運方面，現在雖已有日本來作為它的勁敵，但是太古怡和的力量，還足以維持而不墜。在產業方面，英國資本主要是集中在煤礦和烟業。前者如河北的開灤、河南的中原，都是中國本部數一數二的大礦。後者如英美烟草公司，它有二萬五千萬元的資本，『不但壟斷了全國的烟葉原料，而且，它的產品竟佔全中國產量百分之四〇左右。至於在紡織業方面，怡和紡織公司本來也有它悠久的歷史，但大戰

以後，與日商的飛躍突進相形之下，却未免太過『見拙』了。

除開英國、日本在華投資的質量，確已遠過於其它列強，而它的躍進速度，更非老大的英國所可比擬。三十年來，日本投資的實數，增加了一千多倍。它在列強對華投資總額中所佔的百分比，增加了三五〇倍。日資在華順暢的發展，如入無人之境的情形，這裏就可看得非常明白。在列強對華的借款方面，除英國外，以日本所佔數額為最大，共計四萬六千三百餘萬日金。日本屢次以清理債務，來威脅我國政府，要求把這些舊債提供確實的担保，換成新債來作為新侵略的一筆大資本。它在中國的金融機關，有橫濱正金、台灣、朝鮮、日本興業、三井、三菱、住友、正隆等銀行，還有專門在殖民地半殖民活動的銀團，像東洋拓殖東亞興業中日實業南滿會社等，更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在交通部門，鐵路投資的實數，到後來已經超過英國，一九三五年止，未償還額尚達264, 788, 616元，也比英國多些。至於航業，它雖祇有三十年的歷史，而且清大連津浦汽船會社的勢力，幾已到了與太古怡和，並駕齊驅的地步。在產業部門，鐵礦幾乎完全在日資手裏，連大冶繁昌的鐵礦，都由於日本的債權，束縛得不能動彈；它在煤業方面的投資數量也很大。在紡織業方面則更加不消說得，它是有極大的勢

力，(一九三一年時，日廠紗線綻已占我國總綻數百分之四一，東北計算在內)，此外甚至在水泥、捲烟、火柴、電氣諸業，日資的活動也幾乎無孔不入。日本對華的投資區域特別集中在東北。日俄戰後，我國自動地替日本資本在東北開了一個方便之門，成爲它的活動的樂園。此外如像青島天津上海廈門，乃是它在關內勢力的重心。

美國對華的投資數額，三十年間增加了十倍，這除日本以外，是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的。不過，因爲它在歷史上參加對華投資的時期是比其他國家落在後面，所以美資的活動，偏重於貿易的經營，在借款上數量是很少的（一九三一年僅美金三千六百餘萬元）。它在鐵道航運方面可以說沒有什麼勢力（遠洋航行在外），但是近年來在新興的航空事業和公路建築方面的活動，它是十分有力的。此外如電氣事業（上海電力公司，電話公司），則摩爾根財團的勢力，是不能忽視的。至於它在一切文化、教育、公益事業方面的投資，那是更值得我們的注意。

三 日本投資勢力的躍進

從一九三一年之後到現在，列強對華投資的陣容，又發生了極大的變動。這一種變動，它足以使中國在某一國的資本控制下淪爲殖民地，因之也可能改變了中國對於其他各

國投資的關係和觀念。當然在這裏，這一次空前持久的世界經濟恐慌有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確是九一八後日本的強佔東北和不斷的侵略中國。

第一，五年以來，日本在華的資本勢力，是無可比擬地急激的增加了。(一)在東北，一切經濟部門，已經完全為日資所控制。五年之內，日本在東北的投資增加了十一萬萬二千餘萬元，而俄英美法諸國原有投資七萬萬元日金，現在只好絡繹撤回，我國在東北的民族資本，則大多數已被沒收。(二)在關內，經過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乃至華北經濟協定的訂立，日資勢力也有突飛的增長，據不很可靠的估計，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對華的新投資，在華北共達七三三百萬元，華南共達三九三百萬元（一九三五，三，三一，天津益世報）。這個數目雖然不免稍嫌過大，却也可以想見日資激增的一般程度，例如在華北，僅僅棉紡業一項，日本新投入資本已有一億圓日金，其他如可以作為華北的滿鐵會社的——興中公司，已於一九三六年初成立，天津電業，海河運輸、耀華玻璃、惠通航空等公司都已陸續建立，而龍烟鐵礦、津石鐵路、塘沽築港，以及化學、捲烟，麵粉、毛織業等，也都已在日資的計劃籌措之中。此外如開灤煤礦，啓新水泥，久大製碱，華新紡紗等華北大企業，也都已在日資勢力範圍之內；甚至像柳江煤礦，竟被關東

軍用武力強佔去了，長城煤礦，也被榆關日本特務機關，強迫改爲中日合辦加入東洋拓殖會社的資本，而劫去經營的實力。所以，日本資本的如此急劇地從東北而向華北躍進，真可以反映它大有囊括華北五省的雄圖。(三)九一八以後，由于全中國民衆抗日浪潮的高漲，日本資本向華中華南的擴張，確曾受到相當的牽制，而未能像它在華北那樣順利的進展，(這裏英資原有勢力的強固，當然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一方面因爲我們對於日本的瘋狂侵略，還沒有給以積極的有效制止，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所提倡的中日經濟提攜，却曾發生了相當大的烟幕作用，所以日本資本的在華勢力，整個說來，還是超過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程度的。例如在中國本部的對外貿易中，日本所佔的地位重復在一天天的增長，日本在華航業的發展，大有壓倒太古怡和的趨勢，日商紡織業已經佔到我國紗錠總數百分之四十五，而且正在以上海福建爲中心，企圖猛烈地向華中和華南去活動。所有這些，都已經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何況，自從兒玉等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華以後，所謂金融合作和棉業合作等，還正在開始切實進行中呢！

第二，由于日本對華投資的這樣突飛猛進，英美看了自然是不肯示弱的。不過直到現在爲止，英國所獻身手還沒有超過純粹的防禦戰。反之，全般的說，它的勢力是繼續地

在衰頹中。它在列強對華貿易中所佔的地位，是一年年地在低落，甚至於落到第四位，而被德國趕過了。它對華北的投資已經陷於一蹶不振的狀態，而日資的勢力却依然在積極的南進，侵入長江流域。爲了挽回它的頹勢起見，英國曾經企圖透過國聯技術合作，透過建設銀公司，聯合美法比意對中國來一次鉅額的投資。可是這種企圖却給日本武力恐嚇住了。英國也曾經單獨向日本求取妥協，共同對華投資，但是羅斯兩次到東京的勸誘都失敗了。於是英國一方面運用它絕對優越的金融勢力，援助中國新貨幣制度的實行，把中國貨幣拉到英鎊集團裏去，以便鞏固它在中國金融市場的霸權；另一方面傾全力於長江以南的鐵道事業（透過退還庚款，建設銀公司等方式），援助廣東的經濟建設（如自來水借款電氣借款等）而積極從事開發海南島，作爲新加坡和香港的中間站。至於英國出口信用放款駐華代表柏克利特的來華，準備一千萬鎊的對華信用貸款，更可以見得老大帝國的對華投資，正在如何積極地企圖挽回它的頹勢。

第三，九一八以後，美國在華的資本勢力，是有很大進展的。例如在列強的對華貿易中，它已昇居第一位，在航空事業和公路方面，它也表現着極敏捷的活動（尤以是中國航空公司成立以後）。最可注意的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美國曾經兩次貸給中國政府約計九千萬元的借款，一九

三六年白銀協定上還有透支的規定。此外，美國在中國金融貨幣市場上的活動力量，也比過去大大地增加了。新貨幣制度就是在英美各保相當的均勢底下維持着的。

第四，我們必須要指出五年來德國在華的資本活動。到一九三一年為止，德國在華的投資數量，比起大戰以前的水準，雖然還相去甚遠（一九一四年共計263.6百萬美金，一九三一年僅87百萬美金），但從九一八以來，它的對華投資却已呈現出非常活躍的姿態來。一方面它和日本攜手合作，關於這，許柏氏（M.C. Shippe）在論德日聯盟與中國的一文中，說得很詳盡。根據本年四月十六日華美晚報所載湯鈞先生的譯文，我們可以知道：一方面，德國對華的貸款，第一次是建築玉萍路的大借款，第二次是最近建築湘黔路的四千萬馬克大借款，這『都是德日合作聯盟中所規定的』。所以，德國在中國中部及西南部鐵道建設上的投資，是含有特別的政治作用，是在『減弱英國抵抗日本的力量』（見上譯文）。同時另一方面，德國和日本的攜手合作，不但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德日防共協定的訂立，便是個標準的例證），即在經濟上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德國與偽滿所訂立的德偽商務協定，不但誰都不能否認它是德國變相地承認偽滿的一種表現，而且在實際上它的確已經允許給與德國在偽滿的特殊的通商權利了。此外在中國對外貿

易上，德國所佔地位已經超越了英國，特別是中國由德國輸入的重工業品是在急速地增加，更給與英美重工業品的在華的銷路以很大的影響。所以，德國對華投資的活躍，無疑是會引起英美資本特別是英資的尖銳衝突的。

至於法國，自從大戰以後，無論商業的活動或投資的進行，都不很積極。俄國更是完全改變了帝俄時代的政策，尤其是從一九三四年中東鐵路讓渡以後，它在過去所投的資金大部分都已收回，資本力量已經小到不足言了。

四 結 論

總括說來，在華投資的各國現在已經可以分爲二大陣營，一邊是日德，另一邊是英美。日本在華的投資目的，已經不僅是利潤的追求而是領土的佔領。投資的發展，每每特別集中在一個地域，這保證它有可能佔領當地，而越發有佔領的需要。日本在華的投資部門，多少是帶着軍事性的，因此，日本對華投資的積極展開，實際就構成了軍事侵略的第一步；它在九一八以後對東北的投資，固然是如此，即在目前開發華北經濟的目的，何嘗不是如此？而且，日本所投資本，不僅直接與中國民族工業的利害相衝突，它的目的，確還在消滅這些民族工業；中國的鐵工業和棉紡工業，便是非常好的例子。德國雖則條件不如日本，但是它對華的投資路線

目下是積極地和日本相提攜，並且企圖促進中國和日本妥協來分一杯羹的。所以在日本沒有把我們的失地交還以前，我們絕對不能存着『利用日資』的觀念，否則我們就會被敵人束縛得緊緊的不能動彈，坐待宣佈最後的死刑。

另一方面，英美對華的投資關係，目下主要還是在追求超額利潤；爲了確保它們在華的資本市場，勢必和日本對立起來，因之英美有運用它們在華的資本力量，來阻止日本繼續進攻中國的可能。當然，它這樣做的時候，決不會超過它們自己的利益所允許的範圍；反之，在中國以最有效的手段從事自衛戰的時候，它們是希望中日之間和平妥協的，這在英國表示得比較明顯。但無論怎樣，英美和日德在某種程度上資本利益的對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所以，在目下，中國對於列強在華的投資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學上的問題，不能抽象地予以一般的論斷。我們一面要堅決反對列強資本所給予我們的束縛，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還得充分運用五年來列強對華投資的新的情勢。換句話說，中國利用外資的問題，首先應當以投資國的目的是否有領土野心爲標準。因之凡是有助於我們，來打擊某一最有野心的投資國家，就不妨在某種限度內歡迎外資，而利用外資。這種歡迎的限度，自然以抗×爲最高原則。超過這個原則所允許的限度，自然是不能許可的。 （徐雲慶）

第三講 中國金融問題

一 中國金融組織的演變

金融的意義或內容，最淺近地說來，就是金錢的流通，所以它是社會現象中最日常普遍的一種，它存在在都市裏，也存在在鄉村裏，它出現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出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事實上就是因為它這樣普遍或廣泛的緣故，社會上才需要建立一種金融機關，來專門從事經營、調節和操縱。至於這種金融機關本身，是富有時間性的；換言之，它要隨着社會的變動而發生變化。中國的金融機關或金融組織當然也不能例外。現在我們就首先敘述它的演變的經過。

中國的金融組織是順着票號、錢莊、銀行這樣的系列發展下來的，其間演變的關鍵是商品經濟的日益發展，和各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侵入，使中國經濟本身也以半殖民地的姿態，開始走上資本主義化的道路。在商品經濟沒有成立以

前，專以經營或操縱金錢流通爲目的的金融機關是不會出現的，¹ 爲那時根本還沒有貨幣這種東西產生出來。中國社會自秦漢以來，商品經濟是登上歷史舞台了，因而相應地也產生了金融機關；不過因爲商品流通的範圍和程度都很狹小，金融機關當時也僅具雛形而已。例如直至鴉片戰爭以前的山西票號，它當時雖然能夠影響或控制全國的金融界，但是畢竟含有十分濃厚的地方色彩。我們且舉銀錢的匯劃爲例：譬如你要匯款到別省甚至隣縣去清理債務關係，就往往要受地點和數額的極大窒礙，因爲各地票號本身是全靠特定的狹隘的商品流通網爲其活動基礎。所以到了鴉片戰爭發生以後，亦即五口通商被迫實現以後，山西票號就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了；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砲彈都已從『條約口岸』射入內地農村，而且一天普遍一天，因而內地對於“條約口岸”的銀錢匯劃就比以前增繁百倍。這樣，明末時代僅具雛形的錢莊組織，當時就迅速地長成起來，替代山西票號的地位。不過錢莊這種組織，還是和以往的山西票號差不多，對於那日益擴大的商品經濟，依然有望塵莫及之感。另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到一九〇〇年前後才正式踏上帝國主義的階段，這就是說，自那時起，歐美各國更以驚人的速度，向中國各地推銷大量的商品，積極地將中國作爲殖民地市場經營起來。因此，那種空前龐大的帝國主義策動

下的商品流通網，就需要一個新的與之相適應的金融流通網來支持它；但是，舊有的錢莊第一因為經營技術（如會計制度、業務組織等）和票號一樣陳舊疎散；第二因為經營方式十九仍為個人企業，資本既極薄弱，對各地的金融聯繫又極為狹隘，却很難圓滑地担負這種任務。這樣現代的金融機關——銀行就應運而生了。這種新興的銀行，計有兩種：一種是外商自己在華開設的，如匯豐、花旗、正金等；一種是華商迎合外商的要求而設的，如通商、中國、交通等。

以上我們說明了中國的金融組織順着票號、錢莊、銀行這樣的程序演變，現在我們還要補述一點它們的近況。山西的票號，不用說，是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了；至於錢莊，却没有完全為銀行所代替。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總恐慌爆發以前，錢莊甚至還佔有很大的勢力，這在內地更明顯；但是以後，尤其是自一九三二年恐慌之神開始撕破中國的假態繁榮，使時代的惡潮正面顯現出來以後，舊有錢莊甚至小型銀行也相繼破落了。據中國經濟情報社統計所得，錢莊在一九三五年就倒閉了一三二家，而且普遍各地。因此近年來各地錢莊為了本身的存在，不得不繼續作最後的掙扎，形成錢莊銀行化的趨勢；換言之，就是在經營技術和方式上竭力效法銀行。譬如上海的福源錢莊，其一切幾與銀行毫無差別。此外各地小銀行或分支行的設立，有許多皆與舊有

的錢莊相關聯，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新演變。此外近年來還有一種新演變，與前述一種可說是相互關聯的，即少數銀行在這恐慌年頭，却與一般錢莊相反，依然能夠獨步繁榮，且有日趨集中之勢，即所謂金融資本的寡頭化。這種寡頭化的趨勢在一九三四年終，中中交三行單獨放款，救濟市面，一九三五年春三行增資改組，以及幣制改革後三行在發行上外匯上所佔據的特殊地位等等事業之中，可以明白見到。江浙銀行與中匯銀行的合而為一，也是表明中國銀行的日趨集中。從前新興銀行替代錢莊，征服錢莊，現在幾家大銀行又在兼併小銀行了。至於外商銀行在華的勢力則仍鞏固不移，而且以後台支持人的資格，日益增長起來，這正反映出中國金融組織的日趨殖民地化的危機。

二 中國金融資本的特質

以上我們說明中國金融組織的演變及其趨勢，現在我們要說到中國金融資本的特質。

按嚴格的科學意義而言，金融資本乃是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結合，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產物。在資本主義新興期間，貨幣固然普遍轉化為嚴格意義下的資本了，但是當時的銀行主要只經營存放的生利業務；換言之，銀行對於一般工商業只有債權債務的關係，而不負事業本

身的經營責任。因此當時一般工商家與銀行是對立的。金融資本則將兩者統一起來。銀行資本直接經營並統制好幾個工商企業，這完全是資本兼併和集中的必然結果。至於中國的金融資本則與此不同：第一它不是由工業資本高度發展而成（中國工業資本本身還逗留在極幼稚的階段上），第二銀行資本對於一般工商業不但祇維繫着一些借貸關係，有時甚至連這一點借貸關係都要謝絕，孤立在生產的圈子之外。這是中國的金融資本最最根本的特徵，嚴格地說起來，它只是單純的銀行資本而已。關於這點，我們可舉一些重要的事實來證明。第一，譬如中國的新興銀行吧，其中以商業儲蓄為命名的就佔百分之六十四；其他以促進工商業相標榜的銀行（約佔百分之二十，如浙江興業、浙江實業、鹽業、墾業、煤業等），實際上也以經營儲蓄部和信託部為主；再如作為國家銀行的中央銀行吧，其業務方向大致亦是如此，譬如國貨銀行實際上只是中央銀行的分行，中央信託局更是由該行公開經營，為的就是要擺脫中央銀行條規的束縛，以便作地產、公債、有獎儲蓄等等非生產的，不過是有肥利可獲的活動。第二，從銀行對工廠的借貸關係上，亦可證明中國的金融資本是站在生產的圈子之外的。據中國銀行歷年的營業報告，該行對工廠放款只及對機關放款的四分之一，同時這種放款還是生利資本而非企業資本，換言之，即

不直接參預生產，因之它對民族工業的前途，沒有一定的盈虧負擔，有時甚至爲了要收回自己的本息，更給民族工業以致命的打擊，亦在所不惜。例如鼎鼎大名的杭州緯成織綢廠吧，就是因爲受着中國銀行的債務追索而於一九三二年春停業，一九三四年秋同樣聞名的上海申新五廠被日人兼併，也是由於華商銀行在財政上不願加以援助所致。這種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從以上兩點，我們可以明白：中國的金融資本和一般生產事業的姻緣是如何微薄。同時它們也指明了中國的新興銀行，在本質上實與過去的錢莊沒有差別。

那末它這種游離生產的根本特徵是怎樣形成的呢？這可以分成兩點來說明：

第一，中國的金融資本是順着票號、錢莊、銀行的演變而一天天地成長起來，站在它背後的促動力原是帝國主義所要求、所控制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爲各帝國主義將大量的商品推銷到中國各地以及向各地吸取它們所需要的原料，就非有就地的金融機關替它們經營貨款的匯劃不可，而錢莊和銀行也是靠了替帝國主義擔負這種買辦的任務，才能使自己繁榮起來。這其間的情形是這樣的：當外貨進口的時候，錢莊就代進出口商開出『莊票』或『公單』，外商銀行就可憑着這種票單向錢莊收回貨款；當土貨出口的時候，進出口商所領得的是『洋款』和『洋公單』而這種『洋款』和『洋公單』

』最後是靠經過錢莊而向外商銀行兌換或付清的。這樣貨款的交割不但可以集中方便，而且幣制上的隔閡分歧也可迎刃而解了。錢莊因為對外商提供這樣的便利，外商就報以可觀的儲金或津貼，因此錢莊就肥胖起來了。華商銀行開始是協助錢莊，必要時予以金融上的通融，使順利完成上述買辦式的任務，以分一杯羹，到現在已直接起而代之了。在這裏，外商銀行曾經竭力維持過這種半封建的金融組織——錢莊，而華商銀行為代錢莊而取得現在代理人的資格，是曾經經過不少『光榮』的鬭爭的。此外中國新興的銀行還竭力替外資和中國政府做一個媒介，凡中國政府機關向外借債，其本息清償常由華商銀行參預管理，例如一九三四年六月發行的六釐庚款公債，以及去年浙贛鐵路公司向德國奧托華而夫工廠押借鐵路建築材料八百萬元，中國銀行皆負責參預償債基金的担保。同時在華商銀行資本的掩護之下，外資也能更順利地進行其經濟侵略工作，過去中華匯業銀行之於日本，現在中國建設銀公司之於英美，便是很好的例子。以上所說的各種機能規定中國金融資本的買辦性，而這種買辦性的確立，是使中國的金融資本不能向生產資本發展的第一個因素。

第二，中國銀行業的蓬勃以及金融資本的成長，除掉依靠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侵略以外，還有賴於中國政府歷年

所發行的公債。中國自民國建元以來，歷年差不多都在內戰之中，消耗掉的砲彈也隨內戰的擴大而一年增多一年，使增稅加捐都不及應付，於是就頻發巨額的公債，以資調撥。截至一九三六年初為止，歷年積欠未清的債款共達十四萬七千餘萬元。按年觀察起來，發行最多的年份在北京政府時代爲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共計四萬萬餘元，在南京國民政府時代爲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共計九萬萬餘元，兩者恰巧都是內戰最頻繁的時候。不過本文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正當這兩個內債發行最濫的年代，恰巧又是中國銀行業最發達的年代，譬如在前一時代，新興銀行達五十餘家，在後一時代亦達四十餘家，這完全反映出中國金融資本的滋長繁榮，一半也是靠了內債的發行。因爲每當政府當局發行新債的時候，總是財政感到竭蹶，甚至自己的統治都危在旦夕的時候，所以那怕發債的條件如何苛刻，它都願意接受下來，何況擔任重債的是勞苦人民，分沾公債厚利的又是他的同伴呢！按中國過去發行債券的情形看來，發出的新債十九是向銀行抵借現款或變賣現款（概以六、七折計算），同時公債利息又定爲六釐至八釐，所以銀行所得的實際總利益，往往爲年息三四分，這自然是可觀的肥利了！因此一般官僚政客就往往將他收括來的“汗血錢”創辦銀行，並吸收民間的游資，專做公債生意。政府每發一次新債，他們就更

可分肥一些。這樣，含有特種意義的中國金融資本就成長起來了。據一般估計，一九三六年一月所改發的統一公債和復興公債十八萬萬元，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落在金融業者手中。他們既然將大量的資本投到政府公債方面，那末要他們投資到利息比較低的甚至有危險的民族工業上面去，自然是萬萬辦不到了。我們因為中國的金融資本跟政府機關和軍事當局結着這樣密切的關係，很像封建社會下的富商巨賈，放高利給封建侯主所形成的關係，所以我們稱它為中國金融資本的高利貸性和封建性。這是阻礙中國金融資本不能向生產資本發展的第二個因素。

從以上兩點看來，我們可以理解中國金融資本的形成，本來就和歐美的金融資本不同，它是從買辦資本和封建的高利貸資本兩個母胎中成長起來的，因而自始至終保留着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兩種特性，而這兩種特性就共同阻礙它向生產資本演變，永遠站在生產的圈子之外！當一九三二——三五年中國經濟恐慌最慘劇的年頭，工商衰落不堪，但是少數大銀行反能日益發達，其原由，在這裏也可完全明白了！

三 近年來的中國金融問題

上面一般地說明了中國金融組織的演變和中國金融資

本的特質以後，我們還要繼續談談近年來所發生的金融問題。這裏我們要談到兩個重要問題，第一爲資金集中都市和資金歸農問題，第二爲貨幣恐慌和幣制改革問題。現在且從第一個說起。

農村資金漸漸地集中都市，原是半殖民地的中國經常有的現象；因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替宗主國家銷納過剩商品，而銷納這過剩商品無疑地是要驅使大批錢財，從農村流入都市——即流入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條約口岸』。固然，帝國主義國家是要向半殖民地的中國採購工業原料的，這裏可使錢財對應地流入農村；但是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國家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採購原料，其數往往較少於洋貨的輸入，同時又因它能夠獨占農產市場的價格，形成工業品與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換；所以因採購原料而流回農村的錢財，只是一部份，它並不能阻止資金向城市集中。自這次世界經濟總恐慌爆發以後，資金集中都市的這種現象，因列強對華傾銷過剩商品較前更甚（而且還包括着過剩的農產品），就表現得格外明顯。上海是中國最大的『條約口岸』，上海中外銀行的庫存很能作爲這一集中過程的指標，今將它列表比較如下：（表在37頁上）

存銀指數自一八〇.六五增至三七一.五三，三年間即增一倍，其速度實足驚人，同時外商銀行所佔存銀百分數由

1931—1933年上海中外銀行存銀統計表

	存銀總數(元)	指 數	華商所佔%	外商所佔%
1931	266,138,000	180.65	67.36	32.64
1933	547,46,000	371.53	49.65	50.35

百分之三二.六四，一躍而為百分之五〇.三五，更能明顯地證實我們前面所說的資金集中城市的原因。此外歷年來內地的動亂不安，也是促進農村資金集中城市的原因之一，因為少數豪富懼怕農村動亂，也把他們收括來的『汗血錢』存放到城市中的大銀行。資金集中城市的結果，一方面是農村金融的極度涸竭，加強高利貸資本在內地的威力，和農村破產的速度；另一方面是使城市患着金融虛腫病，因為那樣集中攏來的資金，在城市中也找不到安全的出路，因為城市中的工商業已隨着農村破產而衰落了。於是攔在銀庫中的存銀就更促進公債標金的投機買賣，使債券標金等投機市場，飛黃騰達起來！

在中國金融趨向這樣畸形發展的時候，一部分銀行家有時也把視線投到另一角落，即投到一般農村改良運動者所從事的合作事業上面去，他們喊出投資農村，發展各種合作社的口號。這一運動的開始是在一九三三年，熱烈宣傳是在一九三四年，到了一九三五年又好像變做一種很平常的活動了。有些人以為這是中國金融資本活動方向的轉換，這

未免把客觀的情勢估計得太高了，其實這正和金融界撥很小一筆款子，在上海辦理工商貸款一樣，是非常狡隘浮面的點綴工作。而且他們辦理合作事業（不論信用或運銷等），主要還不過想嘗試以較新的方式，來兼併舊有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農村中的地位，以完成它對農村金融的全面統治而已。甚至在某種場合，客觀上它還是替帝國主義侵略作開路先鋒。你看，在華北關於棉業合作社的工作，中國金城鹽業等行過去是盡了相當力量的，現在到底給當地農民的利益多，還是給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多呢？

其次，我們要說到近年來中國金融的第二個問題，即貨幣恐慌與幣制改革問題。

大家總還記得，中國金融到一九三四年曾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這變化的關鍵主要是美國的購銀政策。美國推行購銀政策的目的，當然很多，和中國金融有直接關係的，即在以較高的世界銀價將中國存銀誘引到海外去，使中國感到通貨收縮的威脅而向他投降，即將中國幣制聯繫到美元上去。上面說過，近年來中國的『條約口岸』患着金融虛腫病，可是因為白銀政策的關係，到了一九三四年，單是上海現銀就突然減少二萬萬餘元，這自然使金融市場倍感通貨收縮的苦痛。一九三四年八月以後，甚至連債券市場也因銀根緊迫而惡化，銀行錢莊天天擔心擠兌提現一類物價之

猛跌，是不用再說了！政府當局爲了避免財政破產，曾於當年十月頒佈平衡稅令，以杜絕白銀出口，但是販賣白銀的是英商銀行，尤其是日商銀行，和日本浪人武裝偷運，政府是無法防止的，因此貨幣恐慌還是一天嚴重一天。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財部遂被迫放棄銀本位，以不兌現的中中交三行的紙幣爲無限法貨。這就是著名的幣制改革。固然，中國幣制這樣改革以後，因存銀外流而引起擠兌和提現的危險，確可藉法令而避免。但是，因爲中國經常有着大量入超，非有大量外匯來平衡不可。那末，中國怎樣去獲得這些外匯呢？政府的辦法是遣陳光甫赴美締結中美貨幣協定，出售白銀給美國，作爲一般的外匯基金。可是，國家現銀有限，既不能在平時盡數出售，就是售盡也不夠維持多久，所以，如何維持新法幣的外匯市場，還得另想辦法。

本來，中國幣制改革本身，就包含着這一種性質，即列強在華貨幣權的爭奪戰。在幣制改革以前，英美靠着雄厚的經濟勢力，日本靠着槍桿子，着實演過一番大武行。嗣後由於世界主要列強（英美法）對於幣價之穩定愈感需要，而世界貨幣戰之漸趨於沉默之期，中國新幣制的施行，方才於英美兩國的某種默契，維持到現在。自然，中國幣制改革之後，英美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對於中國政府的發言權是大大地增強了，這原是它們爲了牽制日本露骨地侵略中國所運

用的一種手段，而它這種手段本身又提供了一種可能，使英美對於中國問題在某一角落首先開始合作，可是列強在華貨幣權的鬥爭却並沒有就此終結：日本一再企圖在滬發行日本紙幣，以搗亂金融，一再在滬製造暗殺案，中山秀雄案萱生案等等以謀造成恐怖，擾亂市場，一再設法復活中華匯業銀行，以求擴大其金融勢力，所有這些企圖雖然都曾失敗了，却並不是最後的失敗。（例如冀東偽幣在津市之流通，中華匯業銀行復業聲浪之繼續地在提出等）。日本最後將用戰爭來答復它在貨幣戰上的失敗，是非常可能的。

至於中國幣制改革的利弊，對於中國整個政治經濟的影響如何，這完全在於中國自己。不錯，中國之不能保持貨幣權的獨立，依舊不失為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的本色，是有待於澈底擊退列強在華的統治勢力，以謀中國國民經濟獨立的發展的，但是，假如由幣制改革而能便於國家財政之改善，便於鞏固全國的統一與充實抗日的準備，便於接受友邦經濟上的援助，以驅逐我們最大敵人在華的一切努力，乃至在外交上便於與英美法蘇取得一個相當有利的關係，那末這也未始無利於國家。總之，中國施行新幣制的能否有助於中華民族解放的前途，完全在於我們怎樣去運用這點上面。

（駱耕漠）

第四講 中國財政問題

一 什麼是財政

在我們中國，大家對於財政問題是不大關心的，以為這祇是『主其政』『在其位』者的問題。譬如在前清，做戶部尚書的，祇是替皇帝籌錢，可以滿足皇帝和皇室的揮霍奢侈。到了民國時代，做財政部長的，也祇知道如何借外債，發公債，在銀行裏押得動款子，想得出加稅的新花樣，總之有辦法來『開源』供軍閥們的養兵內戰，就算得上好部長，而且還可以『立致巨富』呢。至於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力求國家支出的合理，強固國家的財政基礎，發展民族的經濟力量，那是主管財政的人所很少想到的。這樣處理財政，就是根本不會明瞭財政的社會意義，這樣的財政，必然會遺害國家和人民的。崔敬伯教授說得頂好：『從來言財政者，多認為是國家的財政學，而忘掉是人民的財政學；甚至僅認為是替統治

者籌款管錢的技術問題，而忘掉是替大多數民衆圖謀幸福的主要工具。那樣的財政，僅是聚斂的別名；那樣的財政，僅是暴君的工具！』不過，說來也真可憐，崔教授所痛斥嚴責的財政觀念，在中國老百姓頭腦裏，倒是『天經地義』，視爲當然的呢！

自然，根本說來，在怎麼樣的社會，便有怎麼樣的財政。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既然是資產階級統治人民大衆的工具，所謂財政，也不過是資產階級透過國家的機構，向人民搜刮了來維持統治人民的機關（國家）而已。就像英美那樣，國家財政頂修明頂合理（就對資本主義各國家而言）的國家，其一小部分間接稅的收入，固然是取之於人民大衆，就是一大部分直接稅的所得，名義上儘管是徵收資產階級的利潤所得，要他們從荷包裏挖出一點，但歸根結底，還不是出之於作爲剩餘價值的勞工們的血汗？至於其他收入如像公債，政府還是要從賦稅上面來償還的，結果不僅是人民大衆出錢，資產階級在買賣公債時還可賺一大筆錢呢。可是這樣收來的錢，祇有極少一部分是用來辦理社會利益事業的，如像社會保險，失業津貼之類，最大多數倒用來維持龐大的軍備，去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替資本案找商品的市場和資本的出路，乃至於養着警察來鎮壓罷工，養着法官來保護自己。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頂頂開明的財政，實際也不過

是把一國國民的財富收入，重新來分配一下，使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工具罷了。

上面一段話，是說明現社會財政問題的主要本質和階級根性。不過在這裏，並不是叫我們丟開許多具體的階段，來高高在上地空談財政本質的。就是在私有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財政的優良與否，合理與否，（以資本主義為標準），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大眾的利益，還是有極大關係，需要極大改進的。譬如說，一國財政的收入，假使主要依靠於海關的進口稅，那就會不敢採取保護關稅的政策，來阻遏洋貨輸入以保護本國工業，結果是使本國工業不能發展。又如只管增加工業稅（統稅之類），或是稅制施行的不良（如像中國的二級稅制），便會直接摧殘民族工業的萌芽。至於偏重間接稅而忽略直接稅，那就會使本來窮困的人民負擔更重，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將愈益低落，而社會的不安也將更形嚴重。在支出方面，假使只在提供少數野心家的揮霍，招兵買馬，從事內戰，而忽視了生產上教育上國防上的合理支出，那末結果是使國家內亂不息，生產永不發展，而亡國之禍，就會接踵而至了。自然，我們應該知道：一國的財政狀況，是由當時該國的政治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當然也不會例外。但是我們却更不應忽視：財政對於當時政治經濟狀況，也具有反撥的能動的作用，財政至

改良和合理化，是有可能促進國民經濟相對的發展，消除政治不安的因子，減輕人民大眾的負擔的（如易間接稅為直接稅）。而這種財政問題的解決，是可能在不變革現社會機構的範圍之內完成的。它雖不能消除私有社會中財政問題的根本矛盾，却可能使矛盾的解決，向前接近一步。

上面是說明財政問題的本質意義，和相對的作用。瞭解了它的本質，我們就不致被許多巧妙的理論所欺騙；認清了它的相對的作用，我們才會毫不放過一切變革它的機會。

二 現在中國的財政是怎樣的

說到中國的財政問題，本來應該包括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兩方面。在前清，一切收入都是皇帝的，所以也無所謂中央與地方之分。民國以來，到廿五年為止，中央財政所編製的正式預算，不過幾次。這種預算有幾多效用，有多少人來尊重它，甚至到現在還是疑問。各省政府之編造預算的，亦不過十次，省份既不普遍，根據預算實行的當然更少。在民國十七年以前，軍閥實行割據，截留稅收，使中央和地方財政，混亂到了極點，根本無從分別。這種情形，部分的甚至到現在還繼續着。不過，從大體上說來，中央財政是一國財政的主體，一國財政機能的特殊性和病態傾向，主要地可以在中央財政上反映出來；而地方財政的種種特殊情形，

決不會和中央財政毫無關聯的。所以我們在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中國的中央財政。

遠的不去說它，我們就拿民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的中央財政來說。在這裏，我們顯然可以找到下列幾個主要現象。

第一，中央財政的極度膨脹：我們假定把民國十六年的預算額作爲一〇〇，那末民國廿五年的預算便激增至六五六，即使以民國十七年的作爲一〇〇，民國廿五年的也還增至二二七了。中央財政膨脹率的這樣巨大，是很少見到的。本來，一國的財政，應該是該國國民經濟狀況如實的反映，國民經濟向前發展，一國財政便向前膨脹（同時也是改善）。我們從中國的國際貿易來觀察，假定民國十六年的輸出入總額爲一〇〇，那末民國廿五年即減爲八九，其中出口貿易甚至已從一〇〇減爲七七。假定從全國農產物總輸出值來觀察，以民國十九年爲一〇〇，那末民國二十五年（爲首十月）是七二·〇四，（同時期財政指數從一〇〇增到一三八·九三）；假定再就工業總生產而言（包括在華外廠的發展），民國廿一年是九九·五，到民國廿五年前六個月是九五·四一，）而同時期財政指數則從一〇〇增到一四七·四七）。所有這些統計可以具體地說明：中國近年來的國民經濟是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正在一天天地趨於崩潰；因之也

證明十年來的財政膨脹是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背道而馳，是非生產的過大的膨脹。這種膨脹必然會反撥轉來，給與國民經濟的發展，以極不良的影響。

第二，支出膨脹的破壞性：形成財政預算極度膨脹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節流，換句話說，即由於支出的過度膨脹。而且歲出二倍以上的膨脹，(以民十七年爲一〇〇)其內容又是非生產的，破壞性的。例如民十七年時，軍務費共計二一〇百萬，到廿五年即增至三二七百萬；但它在總支出中所佔的比例，從百分之五一.〇減至百分之三二.二。就是以廿五年表面的預算而論，占百分之三二.二的軍費支出，還是不能說少的。何況這裏還有雙重的欺騙：第一，預算上的軍費數字，是很不可靠的，實際上該項支出，每年要超出預算非常之多；民廿五年祇是購械費一項，預算僅一千二百萬，決算時即增至六千二百二十餘萬，(尚有幾筆軍火不計算在內)，已經超出了五倍。第二，預算上的每一項目，並不能完全代表某項目的支出。例如實際上政務費一項就包括不少軍務費的賬在內，又如民廿四年以後教育文化費中有一大筆是軍事教育費，建設費中也有一部分純粹是軍事性的建設，撫卹費的增加，完全是內戰中官兵死亡增加的表示，特別是異常龐大的補助費，(在廿五年爲105,195千元)，最大部分便是把某一地方的國稅收入，用補助費的名義

半強迫地撥給當地軍閥去擴充軍備，因之完全是軍費支出，所以把這二者都加起來計算，十年來的軍費支出在歲出總額中所佔的比例至少是會維持着它原有地位的；而其絕對數額可怕的增加（遠較預算上為大），乃是整個財政膨脹的最主要的原因。這耗盡國家脂膏的軍務費用，除了極小部分用於國防的軍事而外，其餘主要部份是內戰的資本！

說到支出膨脹的破壞性，債務費是忘不了的。債務費的支出實數，民十七年是159百萬元，民廿五年預算增至239百萬元，在總支出中所佔比例，從百分之三八·五，減至二三·五。無論從實支的增多來說，或從它所佔的成數上來說，中國歲出中的債務費無疑是異常龐大的負擔。然而實際的危機還不僅如此，民廿一年和廿五年兩次國內公債的大整理，都把公債還本日期延長了。例如單就統一公債的整理而言，財部債務費支出每年可省七千二百萬元；所以，中國實際所負的債務，應比預算上大得多，現在不過把一部分負擔延遲到後幾年去償還罷了，將來還不是由國民出錢嗎？

至於政務費方面，照預算上看來，十年中都有飛躍的增加，從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四一·九，計加七倍。不過上面已經說過，民國廿四年以後，許多軍費都轉加到政務費裏去，所以，政務費實際的增加決沒有這麼大，這是可以斷言的。從政務費本身而言，教育文化費實業費建設費的增加，

當然是好的現象(雖然其中有許多是假的),不過像外交費那樣,簡直毫無增加,若以廿二年到廿五年比較起來,反而一直是減少的;弄得駐外使領枵腹從公,情報宣傳,都是無從做起,外交的陣線,可說是殘弱不堪了。又像佔政務費支出五分之一的財務費,即以廿二年和廿五年相較,計增加十三倍之多,其扶搖直上的姿態,大足『雄視同儕』。然而十年之間,財政稅收,不過增加二倍有餘,那末十三倍財務費的支出當然是有極大的浪費!這種浪費,像內務費等,都是不免有的現象,所以,即使政務費是實際增加了,假使這種增加大部分是由於浪費,那末也顯然不是財政上的好現象。

第三, 雙重不合理的國稅收入:爲了迴應膨大的支出,收入也非膨大不可,其開源辦法之一,便是增加稅收。本來,一國稅收的增加,要以國家經濟的發展爲前提,才是正常而合理的現象。但在我國政府的主要收入是關、鹽、統三稅,民十六年時共計三二百萬元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二一·一,民廿五年預算七九〇百萬元,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七二·八,十年來共計增加廿五倍。這三種稅都是間接稅,這三種稅的實際負擔,結果全部落到平民大眾身上。間接稅在國稅收入上佔着這樣重大的比例,是各國所沒有的;間接稅以這樣大的速率增加起來,十年之間平民大眾的負擔增加廿五倍之多,更是任何國家所沒有的。這是國稅收入第一種不合理的現象。

其次就這三種稅而論，廿五年的關稅收入佔總預算的百分之三一·三（最高是二十年度，佔百分之五四·二），其中進口稅經常佔着百分之八五——九〇的地位，換句話說，中國財政的來源，主要是靠着洋貨輸入的。所以自從民十七年關稅稅率改變之後，曾經三度的修訂，這在表面上，似乎是關稅已經自主了，其實却始終沒有跳出財政關稅的窠臼。因此，以保護國內工商業為原則的保護關稅政策，也始終未能實現。這種不合理的實際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鹽稅是衆所公認的惡稅，因為它幾乎完全是小民們的膏血。然而十年之間，鹽稅收入，竟增加了三倍，在鹽稅的五次整理和改訂中，都是爲了加稅。一九三七年四月每担鹽稅普加建設捐一元，和新鹽法中將納稅單位每公斤修改爲市斤，法律上增加鹽稅一倍，還都不算進在內。所以東北失陷後所損失的每年一千餘萬元的鹽稅，年來不但已由關內同胞來負擔，而且大有超過之勢了。鹽稅加徵的結果，弄得華北人民各處爭吃有毒的硝鹽，曾經引起了幾次大規模的屠殺慘劇。

至於統稅的不良，更是直接摧殘民族工業的一種力量。一是增加稅率，二是改變稅級，前者增加民族工業的負擔，後者便於在華外廠的發展。十年之間，除廿二，廿五兩年外，年年都有加稅的新的花樣。所以自從民十九年創辦統稅起，

七年之間，預算收入已經增加五倍。而這七年，却正是民族工業遭逢大恐慌的艱苦年頭。這是國稅收入第二種不合理的地方。

第四，財政對於金融資本依賴性的增加：由於間接稅的一再增加，依然不能彌補這樣膨大的支出，所以十年來中國財政的主要特徵之一，便是赤字財政的形成，而終年借債度日。民十六年度，短絀數為三百萬元，一直增加上去，到廿五年度竟達二二二百萬元，增加七四倍有餘。這些短絀數額，全靠借債來彌補。北京來以，政府時代，全靠外債來挹注的，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主要是依靠借內債（十年中共借外債九千四百七十餘萬元，不及同期內債二十分之一）。發內債，需要手續費，也需要折扣和利息，十元內債祇能當作五元半化（據孫懷仁先生統計）。政府在這駭人的高利貸吸血之下，當然祇能寅吃卯糧，債務越負越多。從民國到民廿五年，共計發行過公債2,888百萬餘元，其中在民十六年以後十年之中所發行的，佔百分之八〇弱，約2,268百萬餘元，民國到民十六的十五年間，倒反祇佔百分之二〇強，約620百萬元。除開已償還的，現在財政部還負18萬萬元（此外還有幾筆公債，以及鐵交等部所發行的，不計算在內）的債。公債之外，尚有短期借款，銀行透支暫墊，為數也不算少。十年之間發行公債和暫借的日益頻繁，正表示出中國財政

對於金融資本依賴性的增大。自然，在這十年之間，中國金融資本迅速地畸形地在成長，乃是提供中國財政趨於這種倚賴性的客觀條件，但是我們不應忽視，財政上的公債政策和借款政策，同時又是促成金融資本集中和成長的主要槓桿。上面說過，公債的發行差不多有一倍的利息，都是裝入了金融資本的腰包。因此十年來通過中國的財政機構，壓榨了國民大眾的收入（間接稅），便由公債的方式，集中成爲這樣一個偉大的，但與生產遠離的金融資本！

三 抗敵時期的財政怎麼辦

就上述四點來看，中國平時的財政，已經孕育着若干重大的危機。支出方面是不合理，收入方面是不公平；收支兩相抵消，經常總存在着赤字狀態。這樣的財政，在國家沒有甚大危險的當兒，已經是勞民傷財，借債過日，阻礙社會發展，而增加貧富對立的了。

但是不幸得很，中國現正處於民族危機極端嚴重的時期，目前成爲全國生死存亡的問題，就在於如何抵抗侵略，保衛祖國。因之，中國財政當前的任務也就在於解決如何能夠維持長期抗戰的軍需的問題，使得我們的戰鬥力能夠維持不墜，而且極度發揚，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很明顯的，在這按時期，照原有的財政方針和財政機構，絕對不能應付這樣

重大的負擔，因為，在支出方面，要有非常鉅大的軍費（軍隊維持費，作戰消耗，動員費用等），而且時期還得非常長久；但在收入方面，因為重要海口既有被封鎖的可能，則作為財政上主要收入的海關進口稅，便會大受打擊；同時在沿海一帶鹽稅區域和通商口岸，也有被擾亂的可能，鹽稅和統稅的收入，也自然就會減少；此外更主要的，目前在財政上藉以維持現狀的公債發行和透支墊借，在那時候，必將大感困難。例如從走私猖獗，華北問題愈趨嚴重以來，財政危機也跟著日益嚴重起來，便是最好的一個證據。所以，舊的財政機構是非適應着改變不可的。

首先要使國家支出完全適應新的要求而改變。當然抗戰期中，最大的支出還是軍費，不過那時候的軍費，性質已經完全變過，不是過去維持軍閥割據進行強盜內戰的資本，而是爭取民族生存的抗戰要求了。同時，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三〇左右的債務費，也應當完全省去，因為外債本息，屬於英美法諸友邦的，可能爭取它們的同情而允予緩付，屬於敵國的，自然可以完全取消；而內債本息，本着有錢出錢的原則，緩付也是不成問題的。其次佔歲出總額百分之四〇左右的政務費，也可能大大的節省，一切駢枝機關，浪費，都可以減低到最少限度，（在民衆救亡組織廣大開展之下，是可能減低的。）在抗戰中不是必要的建設，也可以暫時停止。這

樣一來，平時種種不合理的支出可以大大省下來，用以挹注長期抗戰的軍費支出。

其次，關、鹽、統三種稅的收入雖然減少了，但正可以用新的辦法來開源。第一，沒收敵國一切在華的投資，和親敵漢奸的一切財產，充作抗敵軍費；第二，以有錢的出錢為原則，積極推行直接稅和土地稅。前者現在已經開始徵收所得稅，這是極為合理的財政收入，但是因為治外法權的關係，外商拒絕交付，成效尙未顯著；後者則還在準備中。我們認為中國雖然貧窮，但在國家危急存亡的當兒，一切資本家和地主們，是有『毀家紓難』的必要和可能的。特別是上述兩項稅則的施行，更有使財政收入變成更合理一些的作用存在。第三，在廣大的愛國運動開展之下，可以募集愛國公債，愛國特別捐，華僑救國捐等；在帝國主義違反民意的侵略戰爭中，尙且能向民衆募債，騙錢，何況我們爲了救亡圖存？第四，在普遍的愛國高潮中，的確有集中全國廿億盎斯以上白銀的可能，用來作為發行準備和外匯基金，使得抗戰軍需的要求，更有充分滿足的可能。最後第五，對日抗戰是爲着維護正義的戰爭，必能獲得全世界人民大眾的同情，因之，舉借外債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總而言之，抗敵戰爭爆發以後，雖則現有的財政收入會大受影響，可是更充分更合理的收入，是可能在新的基礎上完滿地達到目的的。

上述收支雙方，可說已經把我國財政上平時的病態、自然而然的完全改正過來了，雖則悲觀論者和恐敵病患者，都在異口同聲地以為中國太窮，財政上經不起跟敵國長期作戰。殊不知，對敵抗戰是我們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爭，同時又是國際上正義的合理的戰爭。在這種新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下面，儘管平時的財政沒有辦法，而非常時的財政政策反是盡足應付的。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到那時候，財政是和民族的命運，最大多數人的命運，團結在一起了。同時，抗敵戰爭又正是改革目下國家財政的絕好機會，新的更合理的國家財政，一定可以在抗戰過程中形成起來！

（徐雪寒）

第五講 中國貿易問題

一 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問題

說到貿易這個問題，它的範圍原是非常廣的。按照普通的辦法，應該把它分成為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兩種。所謂國內貿易，即指以某一國家為範圍的商品流通而言，所謂國際貿易，即是指各國相互間的商品流通而言的。

自然，這兩種貿易的關係和相互間的影響，實際上是異常密切，甚至往往是很難劃分的。比方，我們平常所說『生意的好壞』，有許多地方恰好就是這兩種貿易之綜合的表現；換句話說，這兩種貿易的內容，往往是可以同時包括在某一批生意內的。因為某種商品的流通，最初祇是限於國內，後來到了某一場所，是可能再流向國外去的。舉例來說，上海糧食業商人向內地去收買糧食的時候，買賣雙方（至少是賣方）最初可能祇知道是限於國內的流通，可是到了上海，

往往馬上或是再經過了一次或若干次的轉手，就可以成爲國際貿易的對象了。所以，國內貿易可以祇是限於國內貿易，却也可以同時就是，或者後來又是屬於國際貿易的範疇里去了。

另一方面，假如我們反轉來說則一切國際貿易照理都非經過國內貿易的過程不可。不過，例外的地方當然也有。比方，本國的消費者或是某一生產部門，他們所需要的外國貨物，他們可以直接向國內的外國企業機關去購買，同時，在國內的外國企業，他們所需要的許多生產工具，特別是機械之類，他們可以直接向他們的祖國去訂購。這就是所謂國內外貿易直接交換的方式。這種國內外貿易直接交換的方式，在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它所占整個國際貿易的成分，究屬還是非常少的。除非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例如在我們中國，這種貿易的數額，或在整個國際貿易中所佔的成分，實際上是可能相當大的，（這點我們留待下面再詳細說）因爲外商在華所佔的經濟乃至政治勢力，委實是太大了。

至於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相互間的影響，一般說來是會發生相互間的推動作用的。不過，嚴格地講，那就要看各個經濟部門的實際情形，和一國經濟的發展程度等具體因素了。在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的發展，完全是由國內經濟的發展來決定的；國際貿易也可說是國內貿易的展開（不

是嚴格的說法)；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國際貿易的發展，主要是表示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加強。國內貿易往往要受着國際貿易的甚大影響。這種情形，在中國當然也不會例外的。

關於中國的國內貿易，我們覺得問題似乎比較少些；一來因為大家從日常生活中對於某些問題就比較得容易了解，二來因為國內貿易所涉及的問題，不但範圍比較小些，就是內容也比較簡單。反之，關於中國的國際貿易問題，就複雜而龐大得多。本來，國際貿易問題遠較國內貿易問題為複雜，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不過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似乎更使人難於瞭解罷了。

因此，我們在這里所要講的，預備以國際貿易問題為中心，而以國內貿易問題的解釋，附帶地插在裏面。

二 中國國際貿易的特質

中國的國際貿易，一開始就以帝國主義對華的商品輸出——特別是資本輸出的姿態，表現出來。因此，當國際帝國主義的貿易戰爭愈益劇烈，關稅政策愈益成爲它們保護國內市場的武器時，它們使用暴力和欺詐，奪取了中國的關稅權。中國所徵的關稅稅率，一定要首先得到列強的同意，這就是所謂協定關稅。這樣一來，中國關稅的作用，不但不能

能作為保護國內市場和產業的武器，反而倒可以保障外貨順利地輸入中國。說得更加透澈一點，中國的關稅，簡直成為列強保護外貨輸入中國的利器了。

直到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才自動宣佈了中國的海關進口新稅則，並於翌年二月一日正式實行了。可是實際上新稅則的內容，並沒有超過列強過去所同意的稅率。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九日，當局又宣佈了國定稅則的條例，並於翌年一月一日實施。不差，這次國定稅則的內容，比起過去的新稅則來，協定的成分確又減少了些，可是當時還存在着中日互惠協定，使國定稅則不能完全擺脫協定關稅的成分。不但如此，後來中國當局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二日所宣佈的國定稅則，乃是有利於英美，而一九三四年七月所施行的海關進口新稅則，完全為的滿足日本的要求。中國關稅變來始終脫不掉出主入奴的半殖民地狀態，變成了外交上的犧牲品，而中國國民經濟和民族資本的利益，「日本」障，弄得哭笑不得！自從日本製造了冀東偽組織，以便利走私之後，中國關權又受一直「日本」積極要求減低全國對日關稅，威迫中國的不能完全獨立自主，乃是中

所表現的落後性，直到

現在沒有消失。歐戰期間中國的民族資本雖曾有過一度的活躍，可是大戰一告結束，民族資本就經不起外資的一擊；過去的活躍終於只是曇花一現，此後不但一蹶不振，甚至越發陷於沒落，崩潰或被外資收買的境地。在此情形底下，中國對外貿易的內容，不消說得，仍然祇是以原料農產品去換取列強的工業品而已。很明顯的，中國在這種國際貿易中所受到的不等價交換的損失，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在這次世界經濟恐慌期內。這種不等價交換的性質，也就是中國國際貿易的第二個特質。

由於外商在華經濟勢力的強大而普遍，造成了我們上面所說的國內外貿易中直接交換的有利條件。所謂直接交換有二種方式：外商在華設立公司，一面向農民或其他直接生產者收買原料或手工業製品，一面就以它的全製品來作為付給他們的代價，這是一種方式。外商在華設立工廠，一面向當地的直接生產者收買原料，所產工業品或加工製品，除開銷售中國市場而外，還可以作為中國的輸出品，向其他國家去銷售，例如中國大宗出口蛋製品或紗布等。這種外商工廠，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當然是需要機器零件的，這些生產手段，他們自然可以直接從他們本國運來，根本用不着經過中國國內貿易的手續，這就是所謂直接交換的第二種方式。其實，不但如此，中國國際貿易上主要的進

出口商家，大多還是外商，中國對外貿易(輸出入)可說完全在這些外商進出口商家操縱控制之下，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幾乎無權過問的。外商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勢力的巨大，正是中國國際貿易中的第三個特質。

很顯然的，綜合上面三個特質，誰還能否認中國國際貿易的半殖民地性呢？

三 列強對華貿易戰的新趨勢

這裏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第一是列強對華貿易中所佔比重的消漲和變化；第二就是最近列強對華貿易中商品內容的變化。

大家知道，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在列強對華貿易中所佔的比重，不論進口或出口方面，都佔着首位。九一八事變以後，它所佔有的首位就讓給美國了。這是因為一九三二年以後，海關統計數字不再列入東三省貿易數字的緣故。假使把日本對東北的貿易和在全國的走私貨物，統統加在海關統計數字上去計算，那末很顯然它是依舊佔着首位的。這是九一八前後列強對華貿易的一種新趨勢。其次就中國本部(東四省除外)而言，美國對華貿易在九一八後確有積極的推進，佔了第一把交椅，而同時，德國對華貿易飛躍增長的速度，不但遠過於美國，簡直是中國國際貿易史上罕有的

現象。它在列強對華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是一年年增加，它由第四位而升居第三位，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進口貿易中，它甚至排擠日本而躍居第二位，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它竟雄居過首位，而以一九三六全年來說，它還依舊保持着第三位。德國對華貿易的如此激增，正與日本對華貿易實際上的繼續增大相適應着。結果是大英帝國被擠壓而退居了第四位。美國對華貿易相對的不振也是事實，這是最近列強對華貿易的又一種新趨勢。這兩種趨勢，我們都可以把它們放在上面所說的第一個方面去觀察。

說到第二方面，我們可以指出一個特點來。這就是，列強在對華貿易的競爭中，最近已愈加傾向到積極爭取原料上面去。中國近兩年來出口貿易的逐漸增進，到了一九三六年來尤其顯著，這的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同時，這種出口的增加是由於糧食或其他農產原料出口額的增加，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但是，這些事實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顯然的，這是反映出列強的準備戰爭確是已到了空前迫切的程度了。而且同時，反映出，半殖民地的中國，主要要用原料和農產品輸出額的增加，來抵補它國際收入中的巨額虧損的。這種現象，當然不單是中國有之，即在其半殖民地國家或弱小民族，也都表現得非常顯著。（參閱現代殖民地經濟論，新知版）

四 中國國際貿易與國民經濟

在最近二年來中國國際貿易入超額的逐漸減少中，在中國出口貿易額的絕對或相對的增加中，我們常常會『到或看到，說這就是中國經濟好轉的表現，這就是中國國民經濟復興的先聲。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却又到處可以看到：工廠是在不斷的關門或拍賣，商店是在陸續的倒閉，勞工大眾的生活是在日益惡化，（由於物價的高漲和收入的減少）農民大眾的境遇依然是愈趨貧苦，知識份子的失業人數且在日益增加。所有這些鐵一般的事實，難道可以說是中國國民經濟好轉甚至復興的結果嗎？假使不然，那末跟中國國際貿易中所表現的不是發生矛盾了嗎？

對於這兩個問題，我們可以肯定地作如此的答復：第一，上述那些鐵一般的事實，不但決不是中國國民經濟好轉的反映，而且倒是國民經濟慢性崩潰的具體表現。第二，對於中國入超減少和出口貿易增加的估計，不是失於不正確，就是太過樂觀。那末我們怎樣從中國國際貿易上來觀察國民經濟呢？

簡要地說，首先我們應該注意的一點是：海關冊中的統計數字究竟有多大的正確性，和進出口額增加的意義究竟在那里？我們認為，假如不把近二年來私貨進口的較精確的

數額加在海關冊中的進口額上去，那末所謂入超的減少，完全是離開事實的空架子。因為洪水汎濫般的私貨進口，不說它公然侵害了中國的關稅主權，反而還要頌揚入超減少的如何光榮，那簡直是自欺欺人罷了！縱使進口數額的確是在減少，也決不能斷定這就是中國國民經濟好轉的反映；因為中國進口貿易額減少的主要原因，祇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中國一般購買力的降低，縱使外貨傾銷進口，也找不到主顧；另一種是外商在華工廠的積極發展，致使中國人的消費，可以購買外廠的產品，以代替外貨的進口。這兩種原因無論屬於那一種，或者兩種原因同時並存，都不能作為中國國民經濟好轉的反映，那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了。

其次我們就得注意，中國出口貿易所增加的是什麼東西，然後我們才可以說：出口貿易的增加究竟對於中國國民經濟有多大的利益。不消說得，中國出口貿易中增加的商品，大部分都是糧食，農產原料（如棉花等）和軍需原料（鐵砂、銅砂、錫、鎢、銻等等）。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這些貨物出口的增加，祇能證明帝國主義列強正在加緊吸取中國原料，說是國民經濟的好轉，還是談不上的。因為經濟落後的中國，祇有工業化的長足發展才是國民經濟好轉的真實基礎。何況，日商最近半年來收買大批的糧食，特別是小麥和鹽，假如這些貨品也是造成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那末我們可以

斷言，這種出口的增加，不但無利於國民經濟，並且是大有害於國計民生的。至於棉紗火柴輸出的增加，（主要是輸到東北及南洋）主要是在華日廠的產品，那也未見得是中國之福吧！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目前的國際貿易，不但不可能存着任何樂觀的奢望，而且應該認清楚：在上述中國國際貿易半殖民地性的特質一天沒有剷除，中國的國際貿易是一天不能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特別是在這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頭，我們必須要求政府當局：爲了保護我們奄奄一息的民族工業，應該切實制止走私，而絕對不應減低關稅；爲了更積極地準備自衛的民族抗戰，爲了抗戰一旦發生所必須積存的軍糧民食和軍需起見，應該有計劃的調整出口貿易，而用有效方法，制止敵人收買我們的糧食和軍需原料。

（姜君辰）

第六講 中國工業問題

一 中國工業的發展過程

我們這裏所說的中國工業問題，是專指資本主義生產的近代工業而言；一切手工業或工場工業的沒落過程，是略而不談了。大家都知道，一國工業的發展程度，就是表示一國經濟的發展程度，它跟整個國家的命運有重大關係。

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開始於帝國主義列強之侵入。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滿清政府爲了自救，就在封建統治的基礎上面，興起軍事性工業的移植。在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八一年之間，江南造船廠招商局馬尾船政局都先後成立。但它的發展，和整個國民經濟是絕少關係的；換句話說，這種軍事性工業的移植，並不建築在一般國民經濟的發展水準上的。到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之役，跟着軍事的失敗，就完全暴露軍事工業移植的無能。而滿清政府逐漸由排

外而媚外，軍事工業移植也就遭受了嚴重打擊。

中日之役滿清政府的屈服，使中國工業發展進入了另一階段。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承認日本得在中國任何通商口岸上從事工業製造，各國跟着也相繼獲得這個十足半殖民地性的特權。接着一八九七年中德膠澳條約，規定德人有在鐵路沿線採掘鑛產之權。這種種特權之奪取，正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走向帝國主義的步調相一致，所以此後資本向華輸出，就分外激烈。而且侵入到了中國的各工業部門，由輕工業到重工業。在這個當兒，中國的官僚資本和地主資本，也稍稍開始向工業投資。這是中國工業化的開端，也就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完成半殖民地化的重要階段。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以後，中國工業進入了新的階段。一方面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對比發生了變動：英俄法德意奧等歐洲國家因為忙着歐洲方面的分贓戰爭，不得不在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上暫取退守政策。美日兩國資本就趁此千載難逢的機會向中國大舉進攻；而日本則因近水樓台的關係，它在中國的投資這時期更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另一方面，戰時的較好的市場景氣，以及參戰國資本之暫時的退守，競爭勢力之相對的減輕，為中國民族工業之發展造成了比較有利的條件。這時中國官僚的掠奪蓄積和地主的地租蓄積，也轉向工業方面進出，便形成了中國民族

工業底『黃金時代』。

但是這『黃金時代』保持得並沒有多久。大戰一告結束，戰時的好景氣就接着消逝。各國資本又重新回到了中國市場。從此幼稚的民族工業又走入了厄運。特別自從一九三二年以後，民族危機和工業危機完全併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戰後的恐慌時期，正是烈強資本侵入的新的時期，而一九二八年起白銀狂潮下的資本流入，更是可驚。

從中國工業的發展階段上，我們首先可以知道：整個工業部門是烈強資本和民族資本的對立矛盾體。這種對立的矛盾體之發展，是決定中國工業前途的趨向的。現在我們進而研究它們雙方的形勢。

二 列強資本的機能

烈強資本向半殖民地國家的移植，一方面固然誘發了當地土著工業的興起，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使當地的資本主義生產，不能有正常的發展。這裏，我們首先觀察它在整個工業中的雄健的勢力。

在重工業部門中，烈強資本佔有極優越的勢力。在煤礦總投資量中，日資佔百分之一一·七三，日英德與中國合資者，佔百分之四〇·五，純粹華資僅佔百分之四八·二二。就中國本部各大礦的產量而言（一九三三年），日資佔百分之

二九，英資佔百分之二三·五，德資佔百分之一·一，至於東北部分，日資煤礦產量佔百分之八四·一，名義上土著資本還佔百分之一四·九。假使連東北在內計算起來，全國煤礦業中，外資的勢力，更雄厚了。

在鐵工業裏，列強資本更是獨佔鰲頭。中國每年新式開採的礦砂，約有二百餘萬噸，其中有百分之六〇左右在東北，完全是日本資本；中國本部的九十萬噸左右的產量中，有百分之九〇左右是和日資有關，而完全受其控制的。每年新式製鍊的四十餘萬噸的生鐵，日本資本佔百分之九五以上。中國著名的鍊鐵工廠，漢冶萍公司的漢陽廠大冶廠，都借有日資，受其控制。

動力工業的電氣業中，一九三四年全國發電容量計四九六，一四〇千瓦，外資佔百分之五〇（二四四，六四五千瓦），中外合資佔百分之三，純粹華資僅佔百分之四七。在造船工業中，英資七家造船公司，密佈於上海九龍香港天津，計資本一一，〇〇〇千兩，三，五〇〇千元，八〇〇千鎊。

在輕工業中，以紡紗工業為主，列強的勢力，是不可搖撼的。以一九三六年為標準，日英資本，占紗錠總數百分之四六·八，占線錠總數百分之七三·四，占布機總數百分之五五·一。此外如捲烟工業，外資產量（以箱為單位）佔百分之五一，銷量佔百分之五三（一九三五年度數字），這裏

還沒有把生產品的真正價值量考慮在內，假使把外資多產上中級煙，華資多產中下級煙計算起來，那末，外資的比重，一定更加大了。

從上面列強資本的喧賓奪主的情形看來，我們可以得出幾個重要概念：第一，列強資本是中國工業發展的觸媒體，而這個觸媒體現在倒是反客為主，成為民族工業的眼前死敵；第二，列強資本特別在重工業方面佔有絕對的優勢，它的目的既在阻礙中國工業的獨立發展，同時它又實行自然資源的掠奪，它決不想在中國建立真正重工業，譬如鐵礦業祇把開採了的鐵砂運回去，鍊成生鐵輸進來，造好機器販賣給你，生產手段的生產就被壟斷了。第三，在輕工業方面，它也能共享低廉原料和濫賤勞動力的福，再憑藉其雄厚的資本，和民族資本作死對頭。日本紗和華紗的競爭，英國捲煙和中國捲煙的競爭，是使民族資本陷於困難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致命作用，它還透過減低關稅，商品傾銷來完成。還要用壟斷原料（如日本壟斷華北的棉花，英國獨占魯豫皖的煙葉），非法剝削（如日本紗廠對於中國勞動者的殖民式的榨取），來增強力量。

所以，列強資本的工業發展，是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不利的，它以本國的資本利害為前提，勢必阻礙和犧牲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

三 殘壘自守的民族工業

民族工業就是中國人自己所開辦的工廠，這種工廠愈發展，那末民族的生產力便有暢通發展的前途，然而，爲什麼現在在中國列強資本愈益強大，而民族工業倒反愈趨式微呢。這是因爲民族工業的『先天不足』，和『後天不良』。

所謂先天不足，就是民族工業內部所存在的矛盾和癥結。第一是民族工業的買辦資本性。中國民族工業原由買辦資本轉化而來，它們一方面替列強做經濟侵略的先鋒（推銷商品的買辦）同時在不和列強資本發生利害衝突的條件之下，也從事獲取產業利潤的活動，所以說它是買辦性的民族資本。這種買辦性的民族資本，隨時要求托庇在列強資本之下，而犧牲自己（民族資本）的獨立發展的前途。所以開平煤礦要依附在英資開灤之下，中原公司（五卅的抵貨運動所助長的）願意歸併於福公司（英資），中國紗布交易所可以開拍日紗；而火柴業的民族工業，也可以和日本資本合作，辦理全國火柴聯營社。買辦性的民族資本，是要犧牲民族資本的獨立自主的發展前途，甘充列強資本的附庸的。第二是民族工業的半封建性。官僚資本和地主資本（兩者都是封建的超經濟剝削的原始蓄積）是民族資本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他們既不敢犧牲其封建剝削的經濟利益，實行土地

革命以掃蕩一切封建殘餘勢力，同時對那用不平等稅制，減低關稅，經濟割據，苛捐雜稅等桎梏來妨礙自己發展的政治組織，也不敢提出半句抗議，實行一點改革。第三，民族工業的借貸資本性。中國任何企業組織，都以獲取非企業利潤性的利息為最低目標。不管企業的盈虧如何，也得支付固定的高額官利；企業有盈餘時，則以紅利形式，幾乎完全分光。所以，民族工業的企業精神是喪失了，資本積累不可能，生產能力改進不可能，企業內部機構的陳舊窳敗，使它喪失和外資競爭的能力。轉而造成向銀行高利借貸，形成債務經營的飲鴆止渴的局面，如華商紗廠的利息負擔幾乎占到生產成本費的三分之一。而一般華資煤礦，逐年來都有產量減少，利息增支的情形。結果往往是借用外債，或者是受外商管轄兼併。漢冶萍的例子是太舊了，裕元北洋華新等紗廠的拍買，倒是眼前的好例子呀！

這種先天不足，假使後天能夠比較有利，民族工業未始沒有轉好的前途。不幸它的外在矛盾又是這樣嚴重。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是在一八九〇年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後。這個時代，正是世界資本主義走上獨占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對華的資本輸出對於民族工業的打擊，已如上述；而殖民地的分割運動，更是直接威脅到它的存在。其次，國內一切半封建因素的桎梏：如像不斷內戰，市場割據，農村

的封建剝削，苛稅雜捐；交通缺乏和運費高昂等，都使稚弱的民族工業，處境分外困難。

這許多內外矛盾，造成民族工業的半壁江山，氣息依依的局面。我們在下面分別加以敘述。

在礦業中佔第一位的是鐵礦。中國每年用新法開採的鐵砂二百萬噸左右，除了一百十餘萬噸是完全日本資本而在東北之外；民族資本年產八九十萬噸，大冶約三十八萬噸，象鼻山約七萬餘噸，繁昌約二十八萬噸，當塗約二十萬噸。但他們所借的日債，差不多多過於資本，每年得強制輸出全部鐵砂給日本。第二是採煤。中國本部年產煤僅二千一百萬噸，而外資關係的各大礦竟佔百分之四〇，華資各大礦僅占百分之二八，小礦占百分之三三，這更表示出華資煤業生產力的低下。中國本部每人每年煤消費量僅〇·〇四九噸，與英國的三·九噸相較，固有天淵之別，連跟意大利的〇·二，日本的〇·五五，也相距十倍。至於石油採掘量，中國本部每年僅二千餘桶，錕鑄鋅等軍需原料品的採掘，更是用原始的手工業生產了。

在冶金工業中，民族資本更衰頹得可憐。民族資本的龍煙公司，漢冶萍公司，宏豫公司，和興鋼鐵廠，早已停止產鐵，僅有譚家磯六河溝公司年產一萬七千噸（一九三四年）左右，保晉公司年產三千六百噸左右。至於有鍊鋼設備

的漢冶萍公司，和興廠等早已停止。僅山西商才鋼廠及各兵工廠稍有出產，每年不過一千噸。所以中國每年要從外國輸入六十萬噸的鋼鐵。換句話說，我國最重要的鋼鐵生產，完全是依賴外國的。此外錫砂產量佔世界百分之七〇左右，錫砂產量佔世界百分之四二，但這些都是手工業生產，中國並沒有一家近代設備的鍊錫鍊鉛的工廠。這樣看來中國民族工業，對於有色金屬工業，幾乎還在原始時代，然而友邦侵略中國的戰爭，已經進入機械化時代了。

和採礦業冶金業有密切關係的是機器工業，然而，直到現在為止，我國整個機械需要，都是仰賴外貨的，以一九三五年計，輸入機械共值約七千萬元。主要都是電力機動力機紡織機，包括列強資本的投資作用在內（如日本紗廠之擴充，庚款退還部分之工程建設），然而這些都不是『機械之機械』，和重工建設沒有多大關係。全國有機器廠五百六十餘家，然而資本數量不過六百餘萬元；規模最大者不過五十萬元，普通都是數千元到二、三萬元的，所以多以修理及製造零件為主。交通工業更是如此，一切機車車輛，都仰賴輸入，各鐵路機器廠祇能修理和裝配。造船業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但是它的前途依舊十分暗淡，除了江南造船廠和馬尾船政局稍有政府生意之外，其他都祇能造小汽船或修理機件。這是因為中國航業生命完全被控制在英日各國手裏的緣故。

化學工業還在萌芽時代，十萬元以上資本的製鹽廠，只有五家；製酸廠十二家，僅有兩家資本是在一百萬元以上的。酒精業雖則祇有五六年歷史，成績倒比較可觀。

半殖民地殖民地工業的一般特徵，本來是生產手段生產部門的微弱不振，民族資本在輕工業方面，總比較佔着一些優勢。那末中國民族資本在輕工業方面的情形怎樣呢？紡紗業是民族資本的驕子，然而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日英資本在這裏也有決定的勢力。自一八一九年至一九三五年，日商紗錠增加七倍，而華商紗錠祇增加了三倍，同時期間華商布機祇增加三倍強，而日商布機增加到二十倍強。近三四年來，民族資本在這裏已經危局難支；以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相較，華商紗錠從百分之五七·一九減到百分之五六·八五，線錠從百分之三三·二五減到三二·五三，布機從百分之四八·二三減低到百分之四七·九五。一九三七年的情形更惡化，因為日本以津青為中心，大大地擴充了紡織業呢。

繅絲業更是不堪回首話當年。以上海為例，卅年前的一九〇九年已有廠三五家，絲車一一，〇八五部，到了一九三五年，廠數反減少到只有三三家，車數僅七，六九〇；距一九三〇年最盛時廠數一〇七家，車數二五，三九五部，更減少得可憐。

火柴業曾盛極一時，但現在是托庇於日人勢力，以求

苟安。捲煙業中，民族資本的生產品價值，不能超過總生產品價值百分之四〇。精鹽業受財政部嚴格限制，不能暢快發展；僅麵粉業裏，民族資本有比較完整的壁壘。

上面所說的是中國民族工業殘破的陣營，這殘破陣營，外受列強資本的侵略，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國內半封建勢力的摧殘，內因本身矛盾的存在，究竟能維持到如何地步呢？

四 民族危機與民族工業

無疑的，民族工業假使不能肅清其內外矛盾，爭取其獨立自主的發展，那末它的前途是暗淡的。

自從一九三二年中國的經濟恐慌爆發後，整個民族工業的命運，本來已經危如累卵。列強資本一天天增大，民族工業到處沒落碰壁。然而在目前，國土的淪陷，民族危機的迫切，使這殘破陣營，更是危在旦夕。友邦的當前要求是『農業中國工業日本』，那末民族工業何以自處呢？在中國，一九三二年起的經濟危機，包含着這種特殊的性質，即民族危機是和民族工業的命運，完全關聯在一起的。

第一是自然資源的喪失 東北的失陷，使民族資本喪失巨量的重工業的自然資源，計百分之七三的鐵藏量，百分之四八的石油藏量 百分之六四的礬石，菱鎂礦百分之百，（均為全國計算）。在目下華北政權處於『半滿州國』式的當兒

，我們的自然資源雖然名義上還沒有直接喪失，但實際上已是友邦經濟開發的對象。華北五省（綏察冀晉魯）的自然富源，計有：全國煤藏量百分之五四·五，（爲日本之十六倍），鐵藏量百分之十五，棉花百分之四二，小麥百分之二六。自然資源的損失，特別是煤鐵等重工業資源的喪失殆盡，一方面是增強敵人侵略和進攻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使民族資本喪失獨立發展的前途，使生產手段生產的工業，無從發展。

第二是國民經濟生產力的喪失。隨着土地的淪亡，附着在這些土地上面的工業企業，也都被敵人所掠奪。在東北，民族資本所組織的企業，全部被沒收被充公被封閉了，沒有一家能倖免的。帝國主義者可以允許你做官僚做豪紳，却不答應你掌握工業生產的經濟命脈的。這就是亡國之痛。就民族的立場說，這種生產力的喪失，在某種程度內比自然資源的喪失更爲嚴重。東北的煤產量佔全國百分之三〇，鐵砂產量佔百分之四六，生鐵佔百分之七〇，石油佔百分之九九（以一九三二年爲標準）。這裏總生產數（一〇〇）是連中國本土法生產的也都包括在內的，否則東北所佔的比重還要更大。生產力的喪失，對於國力的損失是難於計算的。

第三是兼併收買和強佔。這是目前民族工業沒落的悲慘的景象。柳江煤礦被關東軍（這是友軍！）強佔了去，裕元華新裕大等紗廠，被日本強迫收買，使天津的華商紗業，一

掃而空；在友邦的資本和軍力之下，華北正在獎勵植棉，全國火柴業亦在被日本所劫持。外如走私對於民族工業的打擊，日本資本在華中、華南的跋扈，在在都告訴我們，假使再不保衛華北的話，再不奮起抗戰的話，昨日民族工業在東北的劫運，便是今日中國民族工業的歸宿。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包羅萬象的，是偉大的；但不如敵人所進行的『農業中國』來得有力，也不如『華北資料開發』來得實際。爲了替中國工業留下一點點生路，爲了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一切民族資本家應當起來抗爭，一切同胞應該爲收復及保障工業資源，爲保護民族工業而戰。

（徐雪寒）

第七講 中國農業問題

一 中國農業的特殊性

要解說中國農業問題，首先要說明中國農業的特殊性。因為中國在農業方面所成爲問題的，實際上都和那種特殊性有密切關係；我們甚至可以說，那種特殊性，就是中國農業問題所由形成的基本事實。

不過中國農業乃是整個中國經濟的一個部門，因而要說中國農業的特殊性，就要從中國經濟的特殊性上來認識它的意義。一般論中國經濟的人，大概都不會忽視牠那『半殖民地的』或『半封建的』性質。農業上之特殊性，也就不外是整個中國經濟之『半殖民地的』或『半封建的』性質的部分的具體表現。詳細說來，中國農業具有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特殊性，這也規定了中國農業上所發生的一般問題的動態和實質。

因之中國農業經濟必然要顯出下列的形態；即一方面橫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榨取，和對於帝國主義經濟的隸屬依存，形成世界帝國主義原料生產的園田。同時，却又正因其成爲帝國主義的隸屬，成爲帝國主義的商品和資本市場，並提供原料的地域，而必須要配合着保持其落後的封建的關係。因此，中國的農業，就是在帝國主義摧殘與封建勢力剝削的兩重壓迫下，苦苦地掙扎着。所有中國農業上的問題，從這裏都可以得到基本的理解。

二 中國農業問題的全貌

中國農業既有上述特殊性，牠成爲問題的，就不祇是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所有農業全體，都在腐爛崩潰過程中。就全般經濟立論，農業是一個重要生產部門；我們且把農業生產的各方面的現象，分別舉出一個輪廓。

第一是農業勞動生產力的低下 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大小，大體可以說是取決於兩件事實：(1)農耕資本的配合，(2)農業經營的規模。而這兩者又正相關聯着。以前者而論，農耕資本大體包括有四個要素，即土地、農具、農耕家畜及勞動力。中國土地價格在農業資本中所佔比重一向都非常之高，普通約佔百分之八〇以上，而且近數十年來的中國兵亂災荒，並不會怎樣阻止土地價格的一般增加趨勢。用在土

地上的資本成分愈大，則用在其他要素如農具勞動力等方面的比例愈小，結果無論農具和農耕家畜，都簡陋而且缺乏，勞動力極度低廉，而這些事實，恰好構成小規模的零碎經營的前提條件。據說（見馬扎爾 Madjar 所著中國農民經營的經濟及其發展諸傾向）百餘年來，中國農民所經營土地的平均畝數，在日漸減少，至最近亦然。在一七一一年每人平均為九〇畝，一七七二年為二六畝，一八一二年為二一畝，一八八〇年為一〇畝，一九一四年為五畝，戰後為四・二五畝。經營規模愈小，農業勞動生產力就愈形低下。

第二是農民與生產手段的分離。農具、家畜、特別是土地，是主要的農業生產手段。中國封建制度雖在解體過程中，但促成中國封建制解體的外來資本主義勢力，却又因其有通過封建勢力以支配廣大的農民階層之必要，不但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封建體制的澈底崩潰，而且還不斷地助成土地之封建式的集中。當然，土地價格過高，也是農民由其主要生產手段即土地分離的一個次要原因。照前述那位著者在同書中的統計：中國的佃農，在一九一二年佔全農民的百分之二八，至一九三三年則佔百分之三二，同時自耕農則由百分之四九減至百分之四五。自耕農的減少，自耕農耕地的縮小，都是表示農民與土地分離現象的日益顯著。

由以上兩種現象，我們知道中國農業生產上的動態，

是向着崩潰之途邁進的。和上述兩種現象同時發生的，還有農業生產技術的日益衰退。東西學者常常論到中國的農業技術，例如提到灌溉，施肥以及協同耕作等事項，而尤其注意到灌溉方法。如其說灌溉大業，要仰仗一個依賴田賦爲主的集權政府來主持，那末假如在分崩離析的政局之下，集權政府可以依靠關稅或鴉片特稅來維繫其原有的政治勢力，就不但沒有進行大規模灌溉事業的可能，而且也沒有非進行那種事業不可的急需。於是，空前的水旱災害，乃連續光臨，連帶着國際資本主義的侵蝕，以及政治軍事動亂而日益增大增強的破壞與榨取，遂不期然而然在中國農業的整個生產行程上，造成下列幾種現象：

- (一)因爲農民被迫離村，和無法獲得再生產的手段，而使耕地荒廢的範圍，愈益擴大。
- (二)荒地範圍擴大，同時對於勉強耕作的土地，在經營上又不絕增加其零碎分割的程度，結果是農業生產愈形減退。
- (三)灌溉破壞，肥料缺乏，農具家畜種子殘缺，再加上適當的人工的缺如，於是在生產量減少之外，更引起農業生產物惡化的情形。
- (四)不論是耕地縮小，農業生產物減退，以及農產物惡化，結果都要引起農民失業，貧困和飢餓。這種結

果，又會轉過來變成農業勞動生產力低下，農產物減退的原因。

總之，這一切，是中國農業生產行程崩潰的一般現象，同時亦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中國農業問題的全貌。

三 中國農業問題的癥結及其動態

我們如其不能默然讓中國農業這樣崩潰下去，對於農業上發生的這些問題，就不能不求出它的根本原因。說到這裏，依然要回到我們前面說過的中國農業的特殊性；即中國農業問題的癥結，在於遭受帝國主義的侵蝕和封建勢力的剝削，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苟合，所由維持的生產關係，所由形成的頑硬外殼，使箍在牠裏面的農業生產力，失却發揚滋長的生機，以致引起全面的潰爛。

最近人們從農業觀點來論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生產關係，多用下表來表示：

帝國主義布爾喬亞	}.....農民	}	農業勞動者
軍閥，官僚，劣紳			佃農
地主，富農			貧農
商人，資本家			中農
高利貸者			

上表不過是一個大體輪廓。地主、劣紳、官僚、富農乃至軍閥高利貸者，通常都是息息相通或一身兼為數種方式的

農民壓迫者。同時在農民方面的佃農、貧農、農業勞動者間，也沒有怎樣嚴格的界限，許多農業勞動者，同時又是佃農，或半自耕的貧農。但無論如何，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顯然的分野，却是構成農業生產關係的樞紐。要就此種根本事實，來說明中國農業生產力橫被摧殘或農業生產行程日趨崩潰的究竟，我們須把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在現階段所加於中國農業的破壞壓力，略加說明。

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恐慌，加深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商品及資本市場的矛盾衝突，這種衝突引起軍需原料的需要，更使牠們不能不在封鎖牠們自己的殖民地以外，再加緊向沒有防衛力的半殖民地角逐。我國東北及華北的失陷和特殊化，就是那種角逐最明顯的表現；我們如捨此不談，而祇說到它所及於中國農業的一般惡果，則有：

- (一) 農業原料的國際依賴化或殖民地化 帝國主義在這方面的作用，是一面由於破壞中國的民族工業，另一面由於軍需原料的需要，使中國農業原料增加其對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依存性。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固然是表示日本願望的有力說明，同時其他帝國主義者亦莫不在作此打算，作此活動。我們試一檢察近數年中的桐油、生絲、棉花、茶葉的出口數字的變動，就可說明這一點。

(二)農產品價格的跌落 單就農產品的對外依存性說，其價格無疑會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和國際及國內資本家的操縱；而各種洋貨（農業方面的）的大量傾銷，又使有些供國內需要的農產品（如米麥等等）鬧出豐年成災的怪現象。至若（一九三六年）大豐之年的糧食飛漲，那是由於漢奸或奸商們所造成的特殊現象。

(三)農村副業的破產 農村副業在中國農業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帝國主義用傾銷政策給予農村副業以澈底打擊，這是各種統計數字都可以證明的。

(四)農村金融的涸竭 帝國主義在這方面的破壞作用，是直接間接操縱中國的金融脈絡，捉弄中國的貨幣制度，使原來保存在農村方面的少些活動資金，都匯集到沿海大口岸，然後一批一批的注入牠們的金庫。當然中國的農村動亂，也是農業金融涸竭的一種原因，但如追究農村為何發生動亂，那又不能不由帝國主義來分擔一大部分責任了。

至於和帝國主義侵蝕作用相配合，或者藉帝國主義來延續它的生存，增強它的魔力的封建勢力，那是用下面幾種的活動，來發揮腐爛和破壞作用的：

- (一)高利貸的活動 隨着農村破產，或金融涸竭而肆其淫威的，就是舊式典當，舊式放款以及在某種限度內的新式農村貸款一類的高利貸活動。從事這種活動，不單是國內的土豪、商人、買辦資本家，就是對中國樂善好施的『友邦』人士，也特別努力。華北的天津濟南青島，華南的廈門福州乃至長江流域的上海漢口等地，都有他們在從事此種活動。
- (二)捐稅徭役的榨取 事實上，高利貸活動不但和帝國主義的榨取方式配合，也和封建榨取的其他方式配合。例如，由外貨傾銷所造成的巨額入超，由工業破產所造成的失業洪流，乃至由都市及農村失業動亂所要求的救濟與鎮壓，在在皆有促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的傾向；換言之，即有增繁增重其捐稅徭役的必要。結果就引起普遍增加捐稅和徭役；廢除苛雜的效果如何，是衆所週知的。
- (三)圈地和土地掠奪 這種活動的前哨，(日本帝國主義在滿州華北各地，任意圈劃中國人民土地，這裏且不論及。)主要是所謂『匪區』的擴大，但其實除江西、福建、四川、湖北、陝西、甘肅…等省『匪區』而外，由高利貸壓迫，由水旱災壓迫，由捐稅徭役

壓迫，而實行離鄉別土的衆多農民所遺下的土地，不也是在多種方式之下，集中到貪官污吏土豪高利貸者的手中了麼？至官圈或非官圈的土地的用途，那並不是用以從事較大規模的或大規模的新式經營，而是多半讓牠荒廢。此外，由築堤築路導河作壩所圈佔的大量土地，雖其作用不同，然在某種方面增大中國農業的災難，則並無二致。

總之，上面這種事實，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共同摧殘中國農業的如實說明，而本文前節所說中國農業生產行程總崩潰的真相，或表現在那種總崩潰現象中的各種農業問題，從這裏，都可以得出解決的途徑或端倪。

四 今後的救濟方策

關於中國農業生產行程總崩潰的救濟方策，即是關於農業問題的解決方策，這裏沒有詳細解說的機會，不過根據我們前面所論到的中國農業問題的癥結，也可以知道，當前國內學者及行政當局所提倡的或進行的許多方策，都不會觸到痛癢之處。例如實業部的改進農業四年計劃，（目前已在部分進行中）如發展農業金融，設立耕地合作社，設置農業倉庫，實行農業推廣，籌設並整理全國農事試驗場，設立農具研究製造廠，改進蠶業等等，就計劃本身看來，也很頭

頭是道，但一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破壞作用，以及已經破壞的深度，一加考量，就知道這種枝節的改良的辦法，決沒有很大用處。即使在極短的期間，在極小的地域，對於奄奄待斃的農村，能有萬一的救助，但是對於陷在總崩潰慘狀的全國農業，並不能有濟於事。至於在這種救濟辦法之外，提出了五顏六色的農村統制方案，如像土地統制，農村金融統制，農村生產統制，農產物運銷統制等等，都和實業部的四年計劃一樣，沒有收到多大實效的可能。因為在帝國主義力量深入內地，而又參錯着封建勢力的國度裏，施行任何統制的結果，終會發現『此路不通』。因此，真能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方策，只有下列的途徑：

- (一)中國農業問題的解決，和整個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分開。
- (二)剷除帝國主義和夥同帝國主義狼狽爲奸的封建勢力，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也就是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主要關鍵。
- (三)所以研究並施行如何打倒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步驟，那才是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開端。

(王漁邨)

第八講 中國交通問題

一 中國的交通事業

交通是指兩地的人民互相來往互相傳達音信而言；因而所謂交通事業，就是指的便於兩地人民來往的各項建設與設備，譬如土路、公路，鐵路的開闢和修築，海空航行線的建立，以及車輛、船隻、飛機等設備，更廣泛點說，郵電事業的開發等等，都包括在交通事業這一項目之下。這種交通事業的發展，無疑是能夠促使工商業前進的，因為它使商品的流通範圍擴大起來，同時又使商品的流動過程迅速起來。我們總還記得十五六世紀西歐指南針的發明；以及航海術的改進，十八世紀火車與汽船的發明，對於歐陸各國的產業勃興，起了如何策動的力量吧。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更應認識，交通事業的發展本身，在根源上還是受着工商業——更明確點說，是受着當時社會生產諸力以及生產諸關係的

發展所規定的。譬如上面所說的指南針和航海術的發明和改進吧，實際上全在當時興盛的商業資本主義經濟（以工場手工業爲其主要基礎）積極要求向外擴大市場這一刺激之下，才形成這樣可能的。假使當時英倫三島，歐陸諸國，以及地中海北岸諸重要城鎮，商業資本還未曾充分發達，工場手工業還未曾爛熟到力求國外市場的地步，那末這些發明與改進之是否能夠存在，就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事。至於火車與汽船，更是英國產業革命直接的產物。再就中國爲例，說遠的，如指南針航海術都發明在千餘年之前，但終未嘗發現新大陸，甚至還不曾被廣泛應用而稍加改進；近的如一八六九年時，滿清政府以二十八萬兩規銀贖回通車未久的外人敷設的淞滬鐵路，並將路軌撤毀，投諸台灣海中，一方面固然和民間的猛烈的排外心理以及閉塞風氣有關，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正是說明中國當時的商品經濟極形狹隘，對於那種新式交通工具，還根本感覺不到需要。所以社會的交通事業，在根源上是隨着該社會的工商業的發展而發展的，雖然在它發展以後能有促進工商業再向前發展的反撥作用，然亦不過止於反撥作用而已。

這一定律應用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完全符合的，譬如產業革命在英法德諸國先後登上歷史舞台以後，鐵路與輪船就相應地發展起來，蘇彝士運河也開闢出來了。但

是因此就說這一定律能夠依樣葫蘆地完全適用於中國，那未免就要陷於太機械，太單純的錯誤。因為一談到中國的任何問題，我們就不得不注意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中國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特別自前世紀的九十年代以後，早已不是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它的一切設施都要受外來帝國主義的擺佈，交通事業當然不能例外。因此在羊角車、騾子和苦力載運着貨物的山路旁邊，會有惡魔一般的火車的行列竄過；在大小帆船密集的口岸中間，也會有高大的輪船出現，近數年來就連飛機和無線電站也在內地露面了。這些指明中國新興的各項交通事業是早熟的，不是順應着中國本身工商業的發展和要求，而是由各帝國主義國家偏面地移植過來，因此這些新興的交通事業，十九都控制在外來資本之下，都替外貨外資侵入效勞；同時各種交通事業的發展，也不會是中國國民經濟（民族資本）發展之必然的前提或結果。

各帝國主義國家這樣努力地將各項前進的交通工具移植到中國來，當然是不懷好心的，他們的唯一目的，即在確立他們的侵略基礎，並使各項侵略得以順暢地發展：第一，他們的過剩商品可以不受山路帆船的限制，得能大量地迅速地流入中國的窮鄉僻壤，將所有的農民都束縛在他們的資本之下；第二，他們的海陸軍必要時亦得以順利地開入內

地，支持並擴大他們的侵略或鎮壓殖民地革命。近年來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不特中國本身渺小的交通事業受到打擊，就是列強在華的交通事業也感到不景氣，這是事態的一方面。同時在另一方面，因為列強備戰的猛烈以及加緊對殖民地的侵略，中國的交通事業又以戰神吹打手的姿態繁榮起來。這種變態的繁榮，更因近年來中國內地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不安，而被人為地促進。這是中國近代交通事業發展史中應加注意的一種新趨勢。

以上我們對於中國的交通事業作了一個總的說明，以下對於四大交通部門——航運、鐵路、公路、航空，加以個別的檢討。

二. 喧賓奪主的航業

中國的新式航運業是帝國主義一手造成的，遠在前世紀六十年代就出現了，我們可以將它分成國際和國內兩方面來檢討。國外航業就是和別國的海運往來，表面上是採取互惠的原則，即相互開闢一定的商埠，容許彼此商輪往來。但是因為中國的國際貿易完全被帝國主義所壟斷，貿易的最大部分是外貨的入超，輸出的土貨也全由條約口岸的外國洋行經手包辦，再加上自己又沒有雄厚資本來支持海外航運，所以實際上海外航業全是帝國主義獨霸的世界。

一九三二年中國各口岸往來外洋的船舶共計四四、五四〇、八〇五噸，其中華輪只佔百分之七·九。再如上海一埠吧，一九三三年往來外洋的船舶共計一七、八八一、九二八噸，其中華輪僅佔百分之〇·八。這種比例關係，自海禁開放八十餘年以來，絲毫沒有改善，每年運費損失之巨，在數千萬元以上。至於本國的內河航業，本來是一國國家主權所在，對於外輪並不開放的，但是中國却是例外，容許列強在我們的珠江長江海河甚至深入湘江川江，經營定期航業。中國國內航行權的喪失，開始於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及一八五八年所締結的中英天津條約。（該約第四十七款稱：『英商船隻得在約內准開通商各口貿易……』。此外該約第三十款及三十一款亦有連帶關係之規定）。嗣後各國按照互惠協定，享受同等權利，這樣中國國內航行權就對列強全部開放了。而且在這方面，華輪因資力有限，經營不善，又全為外輪所操縱，例如在本世紀初年，外輪有一五二、〇〇〇噸，華輪僅五四、〇〇〇噸，僅及前者三分之一，這種喧賓奪主的形勢，近年來仍無多大變更。中國航業之半殖民地性，由前述兩方面看來，真是畢露無遺了。

我們假使要想更具體地曉得中國民族航業難與外輪抗衡，以及近年來所受經濟恐慌的打擊如何嚴重等情形，只要提到招商局的改組就可瞭然。該局開辦迄今，已有六十餘年

，一九三二年冬，終因『九一八』『一二八』等影響，無法支持，交由財交兩部整頓；但是整頓迄今，該局所負的巨額債款，仍無法應付。每年營業利潤，不足嘗付所欠英美銀行的外債。一九三七年起，該局欠匯豐的債務辦法解決，此後的情形或許會稍有生氣。至於外輪，它們雖然也受經濟恐慌的影響，但是它們可以用雄厚資本及各種特權來打擊華輪，以彌補其損失，所以英商的太古、怡和，尤其是日商的日清、大阪等公司，近年來仍能擴充其業務，維持其原有勢力而不墮。

說到這裏，我們要來看看英日兩國在華的航業爭霸戰。本來，英國在華的航運勢力較日本強得多，尤其是當『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前後，因國內抗日抵貨運動的熱烈，英商遂更占優勢；不過近一二年來，英日間的陣容已生變化。第一，中日『親善』政策推行的結果，日輪在華已毫無政治上的阻力；第二，近年日本對華貿易昂首突進，日本航業自然就積極活躍起來。尤其重要的，自一九三四年八月以後，源源不絕的私貨，使英商（華商當然不用說）在華北華中的貨運，大受打擊。第三，華北政權的日益傀儡化，日本資本對華北的控制，天天加強，使日貨輸入華北，日資投入華北也更加積極，這無疑的就使華北航運，落入日本手中。在日本侵略下，英輪固然也相形見絀，不過受到損失頂大

的，總是華輪。華北幾家較大華商航業公司陸續都被日本所強制收買，今日的華北航業，已步東北後塵了。華南和華中的華商航業，雖則竭力掙扎，但也奄奄一息，勉強自保而已。所以，我們應當特別注意：近年來日輪這樣猖獗，很明顯地和它對華整個侵略的加緊，是保有密切關係的。

三 突飛猛進的鐵路

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的鐵路敷設權，比對於中國的內河航行權更加注意，因為它不僅可以使商品普遍流轉，而且鐵路所經過的地方還會變成它們所獨占的勢力圈，所以中國鐵路的發展史，同時就是列強在華的爭霸史，過去如此，現在也還是如此。

中國的鐵路建設雖然早在一八六三年就已發動，但是顯著地進展終在一八九〇年以後。各路的興築雖然大部份皆為借款方式或合資方式，但實際已與割讓無異（其中獲得路權最多的為英國，日法德次之），所以直到目下為止，我們的鐵道部却不能算是國有各鐵路的主人，而是這些鐵路的債務奴隸。據最近發表的統計，國內各路所負債務，尚達十二萬萬元以上，外債占十分之九，每公里約負外債十萬元以上，中國的鐵路事業過去所以不能正常地發展，負擔鉅額外債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我們曉得自顧孟餘氏於一九

三二年掌理鐵道部以來，歷任鐵道部長都曾運用各種『整理』方法，將各項鐵路收入增加起來，但結果僅使倫敦我國國有鐵路的債券行市轉趨穩定和上漲而已，對於中國鐵道主權的收復，國民經濟的發展，究竟很少補益；所以鐵道部的一切努力，在客觀上不免是為帝國主義效勞了。

其次，我們更須注意到最近新築若干鐵路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影響。最近所完成的正在積極興築的最重要的鐵道，是粵漢路、錢江大橋、玉萍路、隴海路及同蒲路等等。我們首先要指出，這些新鐵路還是和外資有着密切關係：粵漢路是英庚款，錢江大橋大部分是英款，玉萍路是法西德國和意國資本，隴海和同蒲又都和法資有關。光是利用外資我們就說是替帝國主義者效勞，事情決沒有這樣的簡單。問題是在：我們利用外資，對於我國國民經濟和抗敵禦侮工作的進行是否有利？平心靜氣地說，目下中國的鐵道建築，已經擺脫了四十年前完全受帝國主義強制支配的路線和劃分勢力範圍等的錯誤，這是差堪告慰的。但是假如說這就是國內工商業發展的反映，或者說，這就會促進民族資本獨立的發展，那未免是過於主觀的論斷了。不要說在破產中的民族資本，決不能成為促進築路的主力，就拿這些新築鐵路所經過的路線來說，它們也還是貫通腹地，分別聯接着在帝國主義金融軍事控制下的各主要條約港口的。這就是說，它們祇

便於外國商品和資本的侵入，祇便於中國土產原料的被掠奪，而因此所造成的所謂『市面的繁榮』，不過是半殖民地化過程的繁榮而已！一九三六年粵漢路築成了，大家都以為湘米銷粵的問題便可以解決，但是結果倒反引起外商和販洋米的買辦們聯合進攻，結果洋米免稅記賬，倒反造成了獎勵洋米輸粵的現象。所以，建築鐵路是否就會有利於中國的國民經濟，還是要看其他社會條件來決定的。

說到抗敵禦侮，無疑義的，建築鐵道是可以鞏固國防的，但是另一方面，假使我們不瞭解抗敵戰略上的意義，同時又不能適當地去佈置戰線的話，它也可以是『自撒門籬』，中國著名軍事專家楊杰將軍曾經指出，中國應當採取長期抵抗的疲敵戰，以抵抗日本侵略，爭取最後勝利。因為我國具有採用這種戰略的二大條件：一有廣漠無際交通不便的領土，二有取用不盡的自然的人力的資源。然而現在所積極興築的隴海浙贛粵漢三大幹線，都是自東到西，自北到南地貫穿着中國腹地，而個別地聯接到海州上海廣州，完全在敵人海軍力量所能控制下的口岸。這樣的鐵道建設，技術上的錯誤，至少已經自毀抗敵戰略的有利條件，同時在客觀上又為敵人造成海軍登岸後進攻的優勢了。

最後，我們在這熱鬧的『鐵道年』中，還要鄭重地提醒大家的注意：這一二年來，我國的四大幹線，北甯平京平漢平

綏，不僅變成了日本私貨侵入的大動脈，而且已經變成日本運兵裝械侵占華北的主要根據了。尤其荒謬的，日本還在強迫我們興築津石路，以便取井陘的煤，拊晉省之背。所以，假如一面爲了國防而興築新路，而另一面又爲了邦交而奉送幹線，那就是極端矛盾的事情。但是不幸得很，我國鐵道事業却正在這種矛盾中掙扎呢！

四 一日千里的公路

行駛汽車的公路在中國是比較後起的交通事業，它引起我們的注意，還不過是這六七年來的事情。中國全國的公路在一九二一年僅一千餘公里，到一九三一年纔增至六萬六千餘公里，截至一九三五年爲止，更增至九萬公里以上。公路建設這樣迅速地發展，其主要原因，一九三五年的中國經濟年報曾有極透徹的指出，它說：『政府當局以這樣大的努力和千萬元的金錢來進行公路建設，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便利運兵剿赤。前幾年赤軍主力在江西，所以江西公路發展特別快。一九三五年赤軍主力西移到湖南、貴州、四川、陝西一帶，於是這些地方的公路運動，也就俄然而起了。以四川爲中心的川黔、川鄂、川甘、川陝、川康等路，皆先後動工興築了。公路發展依附軍事的特質，這是極其顯著的例子』。因此，那怕近年來國民經濟日趨衰落，公路還是

可以單獨繁榮的。

在這樣的契機之下發展起來的公路，要想在營業上獲有盈餘，當然是困難的，所以除掉貫通省市的少數幹路外，大多皆在虧蝕之中。路政當局爲了減輕損失就將客貨車價增高（一般總要比火車取費高過三倍），結果就連促進工商業的反撥作用亦難產生。我們假使想全盤理解公路建設對於社會經濟的影響，我們還該把視線投到公路建設的過程中去。第一，年來築路經費，大半皆用各項捐稅名義，取自民間，同時築路的工人，大半又是徭役式的徵工，所以人民對於公路有二重負擔的痛苦；第二，公路所經各地，往往要毀壞田產，據估計目下被毀者已達一萬萬畝左右，這對於農村生產力的破壞，又是一個極有力的槓桿。所以對於目下公路建築的單獨繁榮，確是付了巨大的代價的。

說到現在，全國和平統一的前途，正在大大的開展；公路建設此後或可減少軍事上被動的成份，所謂無計劃的築路和浪費的不經濟性，或者也可隨之避免。因此，不論舊公路的整理和新公路的建築，今後都應當以注意國防爲原則才對。這樣，不但消極的不致自毀長期疲敵戰的優點，而且積極的還可以適當利用公路的長處以增長抗戰的力量。

五 天下三分的航空

民用航空事業可說是交通利器中最進步最銳利的一種，同時也是軍事設備上最重要的一角，而且這兩者的關聯，比商輪與兵艦的關聯還要密切和容易轉化。在第一次大戰中，航空機主要用於偵察，但在未來大戰中，它將是主要的作戰工具。所以近年來英美列強除掉拼命趕造兵艦以外，還要努力航空『建設』。中國是未來大戰的主要對象之一，因此列強的航空戰線也就佈防到中國國境上來了！

在中國交通史上，航空事業的出現比公路還要遲，真在開始的年代是在一九二九年，到現在還只有七八年的歷史。在這七、八年間，起初只是美德兩國資本的對抗競爭，到現在加入了日本，造成了天下三分的爭奪現象。美帝國主義第一因為與中國遠隔重洋，第二因為中國的鐵路事業，它差不多沒有佔着份兒，所以它非向這新興的交通事業加倍努力不可。因此中國航空公司就於一九二九年在它的扶翼之下成立起來，名義上雖為合資，實際上則全為美國資本所操縱。中國的航空交通大半都握在它手中，它歷年營業發展之迅速，可從下表看出：

年份	飛行哩數	乘客哩數	乘客人數	郵件公斤數
1929	93,167	106,875	354	3,932
1933	1,024,963	1,451,384	3,010	49,246
1935	1,950,000	5,875,000	10,400	64,010

德國資本爭奪中國航空霸權的代理人是歐亞航空公司成立於一九三一年，規模較小於中國航空公司，它的業務，也日在發展之中，例如：

	飛行哩數	客運人數	貨運公 斤數	郵運公 斤數
1931—1932	136,200	941	4,131	412
1933—1934	486,902	1,074	4,302	4,079

至於號稱三大公司之一的西南民航公司，其營業範圍只能限於一隅，甚少發展，正與招商局為怡和、日清所壓倒一樣。年來除中國歐亞兩公司力圖發展，相互競爭以外，法國也在暗中活躍，與寧桂當局密謀開辦中法航線。英國因為過去在這方面落後一步，年來亦加倍努力，想使香港變為遠東航空的中心，把帝國遠東航線從印度新加坡一直延長到香港；英法列強在這方面的競爭雖然非常激烈，不過都沒有獨特的成功。

直到最近，中美直航的試飛成功，英國同意以香港為美國航機的終點，中英美三國航線都在香港接通以後，遠東航空界已經發生了新的劇變：第一，中國全部的航線（惠通公司除外）已經成為英美在遠東航線的一部分，而且直接受其控制；第二，英美遠東航線的妥協，透露出英美在中國問題上相當合作的前途。

然而此外，却有非常不祥的現象，這就是中日合辦的惠

通公司已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開辦。它有航線六條，不但網佈冀察兩省，將華北交通直接和東北航線聯接起來，而且自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起，已經實行將與東京直接通航了。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交通方面征服華北的又一巨大成功，而是我國民用航空事業稀有的恥辱。惠通與中國歐亞最大不同的地方，便是它帶有更多的軍事侵略性，少具商業性。實際它是受着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的節制，祇是軍部用飛機隊的變形罷了。

以上我們已將中國交通事業的四個重要部門，加以扼要的敘述，其中有兩根紅線差不多是貫穿着每個部門，一是列強對華交通事業的策動與爭奪，一是國內外的軍事要求使各項交通建設更畸形地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交通事業的發展不是本國國民經濟發展以後的產物，而是適應帝國主義開發市場，征服落後國家的要求。到目前這戰雲密佈的年頭，它更能在國民經濟的廢墟上繼續成長起來，這是中國交通事業的特質。這一特質在過去賜與我們的是苦難和悲慘的犧牲，將來呢，也將是更大的苦難和更悲慘的犧牲。所以當這危急存亡之秋，我們非用集體的力量將這特質推毀，使中國交通事業的開發，變為我們國防自救的武器不可！